

领土问题 和历史认识

中日韩三国为何不能携起手来？

〔日〕纈纈厚 著
申荷丽 译

上海三联书店



ISBN 978-7-5426-4702-3



9 787542 647023 >

定价：24.00元

領土問題 和 歷史認識

领土问题 和历史认识

中日韩三国为何不能携起手来？

[日] 纈纈厚 著 申荷丽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中日韩三国为何不能携起手来? /
(日) 纘纘 厚著; 申荷丽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6
ISBN 978-7-5426-4702-3

I. ①领… II. ①纘…②申… III. ①领土问题—研究—日本
②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31.331②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527 号

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

——中日韩三国为何不能携起手来?

著 者 / [日] 纘纘 厚

译 者 / 申荷丽

特约编辑 / 申荷亮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45 千字

印 张 / 4.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702-3/D·254

定 价 / 24.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 021-66510725

内容简介

日本与中国、韩国的领土争端,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之间积压的各种矛盾爆发出来的结果。领土争端的对方——中国和韩国,是过去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对象。正如许多报道所指出的,过去的历史问题使领土之争变得愈加复杂。过去的历史问题不仅是领土争端的原因,同时也是阻碍领土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围绕领土问题,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的隔阂加大,战后日本为与亚洲各国增进友好交往长期付出的努力毁于一旦。显然,这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更是与日本国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日本只有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才能和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重新构筑新的关系,现在正是需要我们重新对历史问题认真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前
言

围绕「领土」、「历史」问题的争端

接受中国报刊的访谈

2012年8月，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的主权问题，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愈加激化。当然，这些领土争端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还有北方领土问题，都是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只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几乎在同一时期集中爆发了出来。

围绕岛屿主权的争端归根到底是海洋资源之争。争端岛屿的周边海域蕴藏有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钼、锰等丰富的海底资源。同时，还涉及本国渔民在传统作业海域进行渔业活动等，岛屿主权是关乎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的重大问题。

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将领土问题视为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来加以评述。那么，在此不禁要问：为什么2012年8月10日韩国李明博总统登上竹岛访问呢？为什么2010年11月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日俄争议的国后岛呢？现在普京已接任俄罗斯总统，据推测，卸任总统职务就任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将寻找时机登择捉岛访问。

本书主要论述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岛屿争端问题。当然，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许多评论指出：中韩两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还有诸多未呈现于表面的棘手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多年来我就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不断地发表评论，也一直关注着领土问题的动向。我认为，围绕岛屿主权的争端问题，仅仅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论述是远远不够的。2012年7月中旬，我接受了《中国日报》（英文版）（1981年创刊，

据说全球发行 50 余万份)报社的访谈。在中国媒体界,《中国日报》(英文版)相对来说言论比较宽松自由,此次采访正值两国关系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报社记者就以下问题征求了我的看法。

第一,日本社会是如何看待东京都知事石原所代表的日本新的右翼势力的?

第二,日本国民中,赞成石原的购岛建议的人占多大比率? 如何寻找解决领土争端的途径?

第三,面对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等诸多严峻而复杂的课题,如何改善中日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我将自己的看法以英文书面形式发送给报社。题目是“构筑连接中日两国人民的桥梁”(Build bridges between two peoples),大致内容如下。

当今日本的政界,大众迎合主义极其盛行。东京都知事石原和大阪市长桥下采取的政治手法就是,利用深植于日本国民观念中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真正的政治家,不会是蓄意挑起事端,在国内外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摩擦,而是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策和途径。石原派的言行恰好与此相反,他们所推行的是背离民主主义的独裁政治。现在中日关系陷入紧张的对峙状态,更需要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及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决不是广大日本民众所期望的。中日两国各自坚持拥有岛屿主权,这本来是长久以来搁置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单方面地想用购岛方式了结,这必然引发冲突,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不可否认,日本国内确实有一部分人赞成用购岛方式解决争端,但是,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能接受这种靠金钱解决的方式。今后,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中日两国之间的岛屿争端,终归要靠两国协商解决,不需要美国插手。从现在来看,美国本身也没有要介入的意向。我相信,中日双方真诚地协商,一定能找到和解的途径,从而也将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过去,日本靠奋发图强实现了经济增长,经历过同样的发展历程,大多数日本人以善意的目光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将有利于中日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这是令人期待和高兴的事情。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即便有些日本人对此表示反感,那也不过是少数人而已。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表示反感或抵触的日本人,可以说是些缺少经济学常识的人。

“政冷经热”的状况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这种不和谐的状况迟早会得到改善。尽管眼下两国间存在着岛屿争端、历史问题等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但是,我相信“政热经热”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因为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期待着社会安宁,建设富裕祥和的国家。

现在,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中日两国不仅在亚洲,在国际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日两国应该携起手来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今后不仅是政府之间的官方交流,更需要大力推进各种民间交流活动,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中国日报》(英文版)是中国主要的英文媒体,以权威、客观的报道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讯息。对于中日岛屿争端问题,《中国日报》(英文版)表明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严正立场,强调岛屿争端对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将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没有过激言论攻击和谴责日方。

由于时值伦敦奥运会期间,报社编排业务繁忙,伦敦奥运会之后

报纸上刊载了访谈内容。随后的8月16日,中国网站上载了访谈概要。而就在此前不久,几名香港民间团体的活动家登上了钓鱼岛,日本国内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引起一阵骚动。长期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两国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异常事态的发生又像是预料之中。

接受中国媒体专访,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中国日报》(英文版)是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媒体,我也理解安排此次专访的用意。我认为,在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上,一定要以中日友好为大原则,靠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智慧共同努力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我对报社发表的看法不过是最基本的原则,并没有特别的新意。

领土争端的背景

最近,日本与中国、韩国围绕岛屿主权的争端集中爆发出来,究其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有观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韩国青年群体中存有反日情绪,日本国民中也普遍存在“厌中”“厌韩”情绪,也就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再加上各个国家都有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便利用排外的民族主义来转移内在矛盾(高原基彰《不安定的民族主义时代——中日韩网民一代相互憎恨的原因》,洋泉社,2006年)等等。

这种分析是极其敏锐的。确实,眼下中日韩各国都有许多内在的矛盾,岛屿争端也是执政者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对外矛盾的一种政治手法吧。不仅是日本,中国、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尽管各国内在的矛盾激化程度有所不同,却都存在所谓“贫富差距”加剧,用老式说法就是国内版的南北问题日益突出的问题。不容置疑,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是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要因,前不久完成了政权交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

另外,执政者为了迎合国民情绪,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从历史上来看这也是政治家惯用的手法。

例如,1982年4月阿根廷和英国围绕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之争引发的一场战争(同年6月14日结束)。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近海的大西洋水域,以1982年3月19日阿根廷人登岛、之后阿根廷军政府出兵占领该岛为导火索,引发了震惊世界的福克兰群岛之战。

在英阿福克兰群岛之战中,阿根廷使用了从法国进口的最新空对舰导弹击沉了英国最新式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英军为了还击,出动了核动力潜艇“征服者”号,用鱼雷击沉了阿根廷主力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岛屿纷争发展成一场投入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战争。

从当时阿根廷国内的形势来看,当局实施军事独裁,失去民意的总统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对福克兰群岛采取军事行动来缓解国内危机。对此,英国政府考虑到该岛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是为了维护大国的尊严和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当时的撒切尔政权迅即作出回应: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请美国出面调和,同时投入了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载地面作战部队约4,000人驶往福克兰群岛。

英阿争岛之战持续了近3个月,以阿根廷的惨败而告终。阿根廷士兵645人阵亡、1,048人负伤、11,313人被俘。获胜的英国一方同样也损失惨重:参战将士256人阵亡、666人负伤、115人被俘。

以上的事例有些骇人听闻,可见,认为岛屿主权争端可以转移国内矛盾或有助于执政者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为了赢得国民的感情支持,煽动国民的排外民族情绪,放弃外交对话,采取武力解决的政治手法是极其愚蠢的。然而,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诉诸武力的蠢行并不少见。

2012年8月,日本政府提议日韩两国共同就竹岛主权问题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对此,韩国政府坚持竹岛是韩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与日方的领土争端问题,拒绝了日方将竹岛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

决的提议。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也同样如此，双方都各自主张钓鱼岛是“本国的领土”，毫不让步。岛屿争端已经陷入了僵持状态，这种紧张局势持续下去，事态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我认为，如果这些岛屿争端问题确实是关系到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话，各当事国应该冷静地坐在一起，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的途径，比方说，甚至可以考虑采取共同开发管理的方式，同时将周边海域划为非武装区域。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双方陷入了互相敌视、互相制裁的境地。

撰写本书的目的

为什么岛屿争端会陷入这般僵局？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从当前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应来看，相互敌视、憎恨的情绪不断高涨。中国和韩国各地举行了反日游行示威，对此各种媒体及互联网上也不失时机地广为报道。

我认为，岛屿争端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致陷入泥沼状态，主要在于日本和中国、韩国之间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如果彻底解决好这些历史问题，类似岛屿主权的历史悬案即便被重新提起，事态也不至于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没有解决好遗留的历史问题，而试图从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领域另寻解决途径，这绝对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必须正视和解决历史问题，否则领土问题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8月18日报道指出，围绕岛屿主权问题“日中韩相互间的不信任”，有必要追根溯源，重新检讨历史问题。

我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这十多年来，经常去中国大陆、台湾及韩国进行调研和收集史料，在大学演讲、授课或参加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些交往活动中，与当地的研究人员、大学生坦诚相

见,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本书中,记述了这些经历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就领土争端等问题阐述了我个人的见解。多年来,通过与中国大陆、台湾及韩国同行的交流,为促进相互理解和友好亲善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看到今日中日、日韩关系陷入僵局,实在令人痛心。

本书构成如下。

第一章根据多年来我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访问交流,结合个人的经历和体验,阐述了我对岛屿争端这一涉及历史问题的看法。第二章探讨了中国各地发起反日游行的背景。以上两章采用了叙议结合的写法。

第三章论述了明治近代国家成立后仅仅7年就发动了对外战争。该章通过考察明治政府发动对外战争的过程及原因,重新探讨日本进行对外扩张的国家病理。

当然,今日的岛屿争端与明治时期对外扩张的国家意志有所不同,但是我认为:尽管时代不同,日本为了扩大本国利益试图扩张领土的这种国家病理是一脉相承的。在此,通过追溯日本的对外扩张史,将有助于我们进行反思:为什么日本国民对国家扩张行为不能加以阻止呢?怎么样才能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对峙关系,来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理解和认同?

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日中、日韩之间积压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迸发的结果。领土争端的一方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另一方中国和韩国则是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正如许多报道所指出的,过去的历史问题使领土争端变得愈加复杂。过去的历史问题不仅是领土争端的原因,同时也是阻碍领土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基于上述认识,第四章论述了从近代到现代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特别是对韩国的认识。

终章题为“尚未解决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问题”,我认为,日本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至今日本政府仍没有很好地进行反

思和检讨。正因为如此,在领土问题上,韩国人民继续追究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对于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在此也阐述了我个人的见解。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是在我原来的著书或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加笔改写。我们必须再次面对历史问题,这是解决领土争端的大前提。为了寻求解决的途径,现在正是需要我们重新对历史问题认真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如果本书能为大家提供些参考,将不胜欣慰。

目 录

前 言 围绕「领土」、「历史」问题的争端

接受中国报刊的访谈 2

领土争端的背景 5

撰写本书的目的 7

第1章 纵观历史

令中方担忧的日本右翼倾向 2

南京大屠杀遗址前的沉思 5

在卢沟桥边 9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 14

在韩国江陵大学受到的震动 19

采取怎样的对中态度 22

不断反省中日战争 23

强者和弱者 25

第2章 如何对待历史

「反日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 32

变化的国民意识 34

第3章

日本对外侵略——占有台湾的历史

- 历史认识的差距难以缩小 35
- 对日情感的复杂化 39
- 为何设置战争史料陈列馆？ 41
- 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冥思 44
- 是否能达成历史和解？ 47
- 「世代友好、永久和平」 49
- 侵略中国的起点 50
- 表明谢罪 54
- 帝国主义和文明化 55
- 被忘却了的出兵台湾 60
- 占有钓鱼岛的历史经纬 61
- 将台湾及澎湖诸岛纳入日本领土 63
- 从脱离华夷秩序到加入万国公法 65
- 占领台湾的意图 67
- 大东亚共荣圈 70
- 甲午战争的评价 71
- 日本主义的形成 73
- 统治大陆的渴望 75

第4章

日本的对韩认识

日韩竹岛之争 86

日本占有朝鲜的野心是从何时萌发的？ 88

吉田松阴的占有朝鲜论 89

开始关注朝鲜 91

杉田鹗山主张的亚洲人民团结论 93

援助朝鲜论的登场 94

「强国日本」的印象增强 97

对韩国、对亚洲认识的构造及特征 99

歪曲对韩认识的「殖民地近代化论」 102

「历史和解」的途径 105

终章

尚未解决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问题

寻找解决领土问题的突破口

历史和解以历史认识为前提 114

谁来承担殖民统治责任？ 115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模糊不清 117

暗中活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 119

第1章

纵观历史

令中方担忧的日本右翼倾向

这是距今 26 年前的事情。中日恢复邦交⁽¹⁾后的第十四个年头，1986 年 8 月 31 日—9 月 10 日，我第一次踏上了访中的旅程。

那时，我刚刚开始历史研究，隶属于 1975 年成立的民间军事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是以五味川纯平氏、小山内宏氏、福岛新吾氏为中心创立的。五味川纯平氏是著名的作家，留下了《人的条件》、《战争和人》等诸多著名的反战小说；小山内宏氏是战后军事评论界的创始人，作为军事评论家常常在电视等媒体上发表评论；福岛新吾氏（专修大学名誉教授）是研究安全保障问题的专家。

民间军事问题研究会创立不久，我便加入了该研究会，投入了军事问题的研究。研究会集聚了许多军事问题专家及活跃在媒体第一线的军事评论家，我可以直接向他们学习请教。对我来说，这里就像是一所“学校”。

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军事研究会就积极寻找机会，为促进中日间的研究交流多次组团访问中国。我参加了 1986 年的访中代表团，此次出访是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邀请进行的访问交流。军事问题专家、当时的军事研究会事务局局长藤井治夫（已故）任代表团长，还有宪法学专家山内敏弘氏（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等 5 人组成。

8 月 31 日下午 2 点 50 分，我们乘坐中国民航 926 次航班从日本成田机场出发，飞行途中遇到雷雨天气，飞机不得不在天津机场临时着陆，我们在机舱内等了大约两个小时。从北京机场下了飞机乘车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时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钟了，负责迎接我们的是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秘书长张士斌和高李良氏一直在那里等候。

第二天(9月1日)上午9点开始,在下榻的北京饭店举行了座谈会。中日双方与会代表分别提出研讨题目,然后大家围绕专题展开讨论。当时,我提出的题目是“中曾根内阁的现状和军国主义复活”,论题似乎大了一些。

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来看,1986(昭和61)年7月22日第3次中曾根内阁成立后,依然强调巩固日美同盟、对中国对亚洲采取强硬的外交路线。1982(昭和57)年11月27日,当时在自民党内不过是第4大派阀领袖的中曾根当选日本总理大臣并组阁以来,1984年11月1日至1985年12月28日第2次组阁,中曾根政权一直延续下来。

中曾根是政界公认的鹰派政客,他一直主张废弃日本国宪法⁽²⁾,制定新宪法。其论调是:二战后日本政府在GHQ(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授意下制定的现行日本国宪法是“强加宪法”。中曾根当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就开始发表修改日本国宪法的言论,甚至亲自作词编了首“修改宪法歌”⁽³⁾。他是青岚会的骨干,被誉为“青年将校”,青岚会是自民党内鹰派议员结成的右翼团体。

中曾根这种人物竟连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不仅令人失望,更是出人预料。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令周边国家及人民甚为担忧。不管自民党内部状况如何,中曾根坚持废弃现行的日本国宪法,无视历史事实,公然将侵略战争说成是大东亚战争⁽⁴⁾,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⁵⁾等,是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在外交方面,中曾根采取亲美路线,强化日美同盟,积极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建立信赖关系。1983年1月,中曾根宣称按照美国的亚洲军事政略,将日本列岛建成“不沉的航母”。中曾根继续执政,无疑将对中国及亚洲近邻国家带来新的威胁,中国方面的担忧是极其自然的。

鉴于上述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在这次访中研讨会上,我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长期以来,从中曾根的言论来看,可以说其“军国主义”思想日趋

猖獗。为什么使用“军国主义”一词呢？因为从中国及亚洲国家来看，中曾根不真诚地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反倒把它说成是大东亚解放战争，并要废弃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这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行径。

从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为了维护现有的日美同盟，必须全力配合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这是确保日本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的政治选择。

日本这种外交态势失去了中国等亚洲近邻国家的信赖，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戒备与防范增强。在日本政府看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日本跟随美国将会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日本的外交选择是基于这种判断做出来的，中曾根就是采用这种政治手法的典型代表。

我还强调说：我并不认为日本为了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外交防卫政策全部是由中曾根一个人来决定的，最大的问题是日本国内对中曾根的言行表示支持的国民意识。

研讨会上，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像中曾根这样的代表日本保守政治的人物，依然稳坐首相之位，这是日本国民的意愿吗？也就是说，日本国民真的支持中曾根氏吗？你认为中曾根氏的作为能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吗？

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许多疑问，我做了如下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解答多少有点儿生硬。

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⁶⁾，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民的观念也有所变化，比如个人利益至上及保守主义倾向，国民对现行体制缺少批判精神，促成了“大日本帝国”这种国家观念的膨胀，导致了军国主义复活和新军国主义的兴起。

中曾根内阁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国民感情的动向，加速地走向军国主义复兴的道路。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为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开绿灯⁽⁷⁾，以及日本的“日章旗、君之代”⁽⁸⁾等问题，这些不仅违背了

日本国和平宪法,也严重伤害了周边国家人民的感情。

为了阻止这种军国主义复活的行径,日本人需要反省和汲取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自觉地检讨战争责任,具体地说就是国民自身没能自觉地阻止那场战争的责任。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或寻求各种机会,努力增进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在相互理解、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与亚洲人民达成共识,实现真正的和平。

我本身并不能提供一种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议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探讨和分析引发这些争议的诸多原因。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就日本政治上的右翼倾向等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与中方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中国方面为我们创造了自由讨论的氛围,大家各抒己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交流活动,我感到:组办座谈、坦诚交流,这本身就是促进双方相互理解、实现和平的良好途径。不仅我个人,同行的日本研究人员也有同感。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体验和感受,此后 20 多年来我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从未间断过。我感到:从国家、政府到民间组织、个人,中日之间需要拓宽渠道、更广泛地开展这种交流活动,只有加强交流相互沟通,才能化解隔膜、消除对立。

南京大屠杀⁽⁹⁾遗址前的沉思

此次访中代表团的最大目的是去南京参观当年开馆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名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同时参观在南京市内 13 个场所建立的屠杀纪念碑。我希望了解碑上所刻录的碑文的内容。

纪念碑各具特色,风格各异,当时惨遭杀害的中国死难者人数等都详细地镌刻在碑上。



南京市内纪念碑

其中有件事情至今深刻地留存在我记忆中,难以忘怀。那是去参观长江沿岸下关码头附近的纪念碑时,在纪念碑前发生的事情。

当我对着纪念碑调整焦距想要拍照时,发现碑上有胡乱涂写的字迹。我无法辨认那些字迹的内容,就问陪同我一起来的中国外交部的人员上面写的是是什么。当时只见他面带难色,边摆手边说“不用了吧”,委婉地避开了。这么一来,我反而更想知道那涂写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我又向另一位年轻的翻译请教,他向我解释说,上面写的是:“就是建造了这么壮观的纪念碑,我那被日军残害的丈夫也不能死而复生啊”。

将侵华日军残暴的记忆留存在纪念碑上,遗族以涂写内心的感慨来抒发无法忍受的悲痛。当时外交部的人员对我的提问避而未答,也许是顾虑到我能否理解这一行为。

建造纪念碑的形式与把历史事实作为文献和资料留存于后世有所不同,高近3米、用混凝土建造的纪念碑矗立在人们能够看到的地方,使人们总是不断地目睹历史事实,感受那段悲痛的回忆。回想起来,当时我站在碑前,自己内心也充满了极其复杂的情感。虽然赞同建立纪念碑的意义,但是触景生情,由此也就触发了那位遗属不由自主地抒发深藏于内心的悲哀吧。每当我在面对和讲述过去那场战争的历史时,纪念碑前的经历以及那位妇女抒发的悲伤和感慨总是会浮现于我的脑海。这一体验,成为我论述中日关系史时的原点。



在南京事件资料馆前

在日本和中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中，两国之间与“战争”相关联的时期毕竟是短暂的。但是，在那场侵华战争中，大量的中国人惨遭杀害，就像在纪念碑上抒发悲伤和感慨的妇女一样，战争留给人们内心的创伤是难以抚平的。即使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那场悲痛的战争史也如同针刺般深深地刺痛着内心。

中日战争⁽¹⁰⁾使中日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了，直到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对两国来说无疑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带了来新的转机。

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日本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对日本来说，希望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¹¹⁾。

在政治方面，日本一直是跟随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2008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访日，进一步促进了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和发展。

中日关系方面，一直流行着“政冷经热”之说。在相当一段时期，

那场战争留下的刺一直被搁置了下来。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由于搁置的时间过于长久,那种刺痛的感觉已经淡漠了,在思想意识上对有过针刺的事实也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我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阅读考证了大量的文献和史料。但是,我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些文献和史料,我一直在思索,永远都不能忘却那些在中日关系史上被捉弄和被迫牺牲的人,尤其是卷入中日战争被残酷杀害的平民百姓。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心情和思索也许就是在南京下关纪念碑前的体验触发产生的。虽然自己意识到在叙述历史时掺杂个人体验和感情要素是晦涩和危险的,但是痛感那场战争的悲惨、如实地讲述历史是极其必要的。

换句话说,历史是通过人的感情来记录,从而也被记忆下来的。那么,如果不能正视那些被历史捉弄的人的感情的话,也就不可能正视历史。

从1986年初次访中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增强,国民的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2010年举办了上海世博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¹²⁾。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不仅与近邻国家,并与中东、非洲国家以及南美等进行贸易交往,同时还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派遣技术人员和提供技术转让等。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稳固,如今中国取代了前苏联,成为当今世界可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大国。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中国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在逐渐增强。中国在外交方面显示出强硬的姿态,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也有增无减。

如今,日中两国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解决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面临着诸多困难。尽管如此,双方要面对现实,通过外交对话和协

商,努力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此,作为日本国民,需要我们深刻地反省过去,汲取历史教训。这种反省和检讨,必须获得对方的谅解,使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能够接受和认同。总之,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要真诚地表明: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决不是为了迎合对方。

对于解决中日领土争端问题,我自身持乐观态度。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深刻地反省历史,为寻求和平解决做出积极的努力,一定能获得受害国及人民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虽说解决历史问题是涉及到对方(受害国及人民)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在于我们自身是否有真诚反省的姿态。

在卢沟桥边

2003年9月,为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国际研讨会,时隔多年,我再次访问了北京。当时已经确定北京将主办2008年奥运会,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着大的改造。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必将呈现出更加崭新的面貌。

我坐在出租车上,望着车窗外砖瓦构造的街边房屋一片片地被拆除的景象,车在因施工导致的凹凸不平的道路上颠簸行驶,朝着架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驶去。66年前,也就是1937(昭和12)年7月7日,这座桥成了中日两军展开军事冲突的现场。日本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卢沟桥事件,中国则称其为“七七事变”。我抵达卢沟桥时,看到永定河的水已经干涸了,河中杂草丛生。草丛中静静地停放着几艘小型观光游船。此景给人一种宛如时间停止的错觉。

卢沟桥两侧雕刻着具有不同形象的石狮,间隔相等地矗立着,极

其美观。在这座美丽的石桥上展开的枪战，之后被视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的开端，这是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吧。

卢沟桥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夜，驻扎在北平（现在的北京）西南部丰台的日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永定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事件的起因是“从中国军队既设阵地的某个方向射来几发实弹”，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清楚。

是谁、又是为何目的发射实弹的呢？至今依然有诸多说法。

已经明确的是，依据这一来路不明的飞弹为理由，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从而，围绕事件处理，中日两军开始交涉，以至日军中枢内部围绕事件处理出现了明显的对立。

由此引发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来路不明的枪弹最终发展成为中日全面战争。

在此有必要提出两点疑问。一个是，来路不明的枪弹没有造成伤害，但为什么日军要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呢？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日军驻扎在北平的近郊，并伺机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呢？此问题虽单纯，却意义重大。

战后日本近代史研究面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认真探讨。不仅是历史研究者，许多日本人也曾对此抱有极大的关心。在中国，虽然把握问题的视点与日本有所不同，它也同样引人注目。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对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淡漠了。中国虽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作为“爱国教育”的一环，特别加强了历史教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也同样变得模糊了，尤其是中日两国的青年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这么思索着，在石桥上走来回地踱步。在道路施工、建筑拆除的喧闹声中，只有这座石桥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好像在努力地向后世如实地诉说着六十多年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站在卢沟桥上看着业已干涸的永定河，我再一次问自己，究竟何谓中日战争？并试图寻求解答，甚至萌发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在

永定河的河水开始流动之前要找出答案。

在卢沟桥上两军发起冲突，宣告了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可以说，早在此之前，日方就已有所预谋和策划准备了。

近代日本在同欧美列强的竞争中，果敢地加入了对近邻中国进行资源与市场的争夺，为此保持了强大的军队，大量地增加军事官僚，从而使军事机构逐渐庞大。

在卢沟桥事件中，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在此之前驻扎在北平近郊，这些行动都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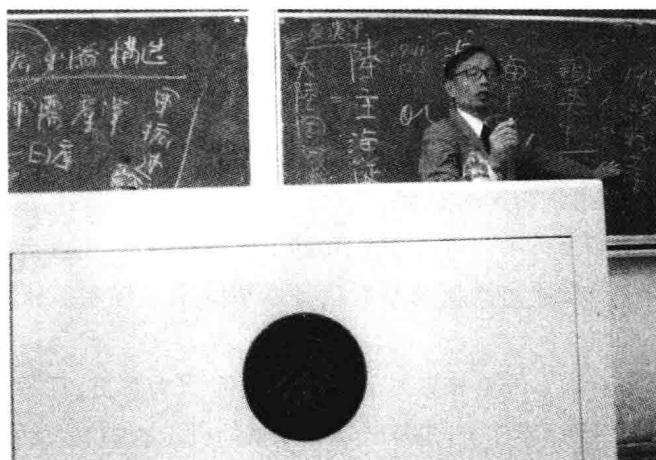
追溯历史，以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¹³⁾为契机，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事实上，自那时起日本就伺机压制中国。经过几场战争之后，日本驻军以卢沟桥为据点，决定推进和实现压制中国的夙愿。这同时也导致了日本开始步入歧途，走向战败之路。

自卢沟桥事件开始到日本战败为止，当时日本军部指导者以及很多日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呢？对拥有辽阔土地和众多人口的中国抱有怎样的意图呢？日本又是怎样在侵华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呢？

在回顾日本近代史时，作为日本发展和失败的历史，中日战争正好处在其转折点上。突出军事力量的近代日本发展史，最终以战败告终。对这一历史事实，有必要以现在的观点重新进行评价，更好地检讨和反思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

2008年10月，应北京大学徐勇教授的邀请，我作为中日战争史研究人员赴北京大学讲学。这次讲学使用了我编著的《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岩波书店出版，2005年）一书的中文译稿，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以及政治、战争指导体制进行了讲解。

讲解之后留有充分的提问和解答时间。北大学生提问非常踊跃，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生成的原因、天皇的侵华战争责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政治构造等问题表示关注。同时，他们极其关心的就



北京大学授课

是：为什么日本人“支持”了侵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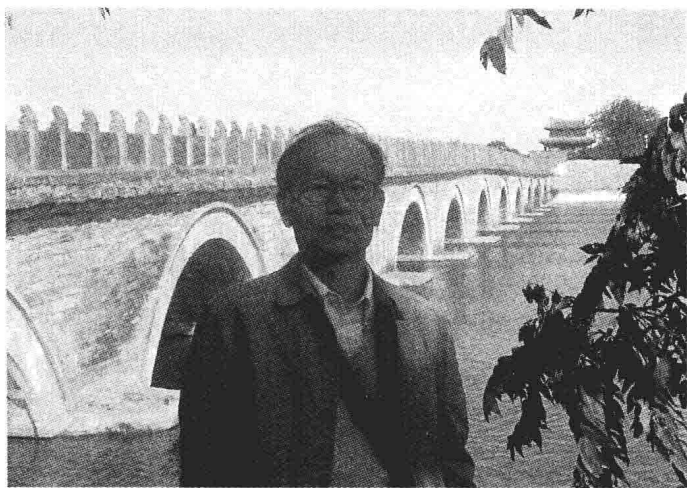
学生的提问包括一些跨学科的问题，大多集中于现在的中日关系、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课题。

根据日本教科书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以日本军部为代表的主战派强制动员国民参战，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意义并不理解。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当时日本国民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但是各种史料表明，日本国民中有支持战争的倾向。授课中，我以各种历史资料为据阐述了个人的观点。将侵华战争的罪责全部推给军部及一小撮军国主义头目，试图免除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试想，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或默许，持续了那么久的一场战争能维持得了吗？我结合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背景，就日本国民之所以支持或消极地默许了那场战争作了必要的说明。从当时日本国内形势来看，财政陷入困境⁽¹⁴⁾，日本媒体协助宣传，把战争说成是为了民族生存之战，煽动国民参战。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对战争充满期待以及踌躇不安中做出了选择。

这么解释,并不是肯定日本的侵华战争,或是为发动战争找口实,从历史现状来看,这确实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人要深刻地汲取历史教训,当再度面对同样的社会困境或陷入危机时,绝不应重蹈覆辙,靠武力向外转嫁危机。最后我强调,正是处于和平时期,有必要构筑中日不战共同体或是和平共同体,中日两国携起手来,联合亚洲各国,为构筑确保亚洲和平的共同体而努力。

在北大讲课之余,我跟徐勇先生一起再次去了卢沟桥。我站在卢沟桥上俯视着永定河,多年前看到的河水干涸、杂草丛生的景象不见了,清湛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1937年7月7日发生枪战的一幕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多年前,我曾想在永定河的河水开始流动之前找出解答,其解答之一就是构筑亚洲和平共同体。怎样去实现这一目标,仍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努力探索。眼下,钓鱼岛争端使中日关系跌入冰点,亚洲和平共同体的构筑遭遇重大挫折。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犹如检验我们能否深刻地反省历史,采取明智的行动。



在卢沟桥边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

北大讲学增进了我与中国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从大学生踊跃的提问和发言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期待。在此之前的访中讲学也有过同样的体验和感受。那是2007年3月30日，我去西安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访问并做学术演讲，演讲题目是“中日关系展望——增进相互理解，构筑共生关系”。

当时，我本打算结合中日战争的研究成果进行演讲，而大学方面建议说：不要讲那场不幸的战争，最好以中日关系展望为话题。大学方面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讲述中日战争或许会激发青年学生的反日情绪，还是尽量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刺激。像这种演讲场合，中国方面通常采取这种方式，这也显示了中方慎重的姿态。然而，这种姿态同时也会使中国青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变得肤浅。历史问题是理性与情感的交织，为汲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只有思维开阔，理性地去思考才能创建新的和平关系。诚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



在西安交大演讲

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中国青年以这种被害为由追究日本的侵华历史,甚至采取非理智的行动也并不可取。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淡化日本和日本人的侵华罪行。

当时,我听取了大学方面的建议,只对中日战争和历史问题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主要以构筑 21 世纪东北亚地域“和平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话题,并结合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 EU)⁽¹⁵⁾的事例,进行了演讲。

演讲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到了提问的时候,出现了未曾预料的场面。因为我想坦诚地与中国大学的师生进行讨论和交流,而讨论的展开出乎我的预料。

在此,就当时提问的情况作一些介绍。提问之一是从东亚全体来看中日关系的未来趋势,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问题。提问者是位年轻的教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他说:“对于将来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中心构筑亚洲版的‘欧盟’,我表示赞同。但是,我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日本至今没有解决好历史认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为这一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国,能赢得信赖吗?二是,如果构成了这一共同体,您认为应该以哪个国家为中心呢?”

这样的提问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问题,以前我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作演讲时,也常常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之后的 2007 年 9 月,在位于济南市的山东大学和大连市的辽宁师范大学进行演讲时,会场上也有人提出了几乎与此相同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年轻教师及学生,好像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当时,那位提问的教师对于我提出的通过构筑亚洲共同体创造和平区域的说法表示充分理解,只是责问日本是否具有这样的资格。其中也含有战争责任的无时效性以及国际性等比较复杂的问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为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积极活动,寻求外交支持。中国及亚洲近邻国家反对日本“入常”之呼声此起彼伏,对日本产生戒备和防范心理。

提问的话语中隐含了对日本方面的期待,希望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拿出真诚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对这一问题,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

所谓历史,如同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座桥梁。在任何情况下,支撑这座桥梁的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桥桁都必须始终保持同样的高度,一边高、一边低是绝对不行的。

为了在历史这座桥上行走,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桥桁必须建成同样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日本好像将过去的桥桁建造得太低了。

我们日本人,为了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也必须下决心重新建造这两个桥桁。这项工程何时结束尚不清楚,我认为要不断地做出努力以保持两个桥桁并行,这是对应战争责任无时效性这一课题。另外,历史认识问题是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端正历史认识是日本赢得国际社会信赖的根本途径。

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哪个国家为中心?我认为这种观念需要转变。的确,过去的战败国德国由于拥有经济实力,加之努力反省过去侵略战争的历史,赢得了较高的评价,从而成为欧盟事实上的中心国。但是,我不认为讨论哪个国家成为中心国会有建设性的意义。

我认为,不是采用中心国的方式,而是采取比如轮流坐庄的方式,轮流担当中心国比较好。最初两年是中国,接下来两年是日本,再往后是韩国,如此轮流坐庄。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构筑了共同体,实际上并不是仅由一国作代表其他国家不去尽力。我认为重要的是大家共同承担构筑的重任。

即使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方面存在差别,所有的加盟国也都是对等的,作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民主主义的场所,应该确立这种和平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心指导国是中国,是日本,是所有的加盟国。这一原则是合乎情理的吧?我认为,如果能稳固地构建这样的亚洲共同体,那么就将避免不幸的历史重演。

对于回答这样的提问,我个人的习惯做法是,不是针对提问直截了当地解答,而是采用比较委婉的说法加以解释,这次同样也采取了这种方式。

听了我的解答之后,与会听众接二连三地开始提出新的问题,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能够充分感受到中国的青年们想认真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和关注未来发展的迫切愿望。大家积极发言提问,会场气氛热烈、活跃,与会师生们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

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我深深感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早已打开了形式上的封闭状态,但长期以来仍然尚未达到真诚地敞开心怀进行广泛讨论、交流的程度。

当然,双方未能达到自由、广泛深入的交流,是由于两国存在各自的情况。在此想特别指出的是,即便存在各自的原因,中日两国之间已恢复邦交 40 年之久,但至今两国之间、尤其是两国人民之间还不能充分地进行自由、广泛、深刻的交流。

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着大量的物资贸易交流,众多的观光游客往返于两国之间。据 2010 年末的资料统计,在日外国人达 2,134,151 人,其中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人占 32%,韩国、北朝鲜人占 13%,两项合计达 55%,超过了半数。

另外,据中日韩三国间的旅游统计表明,去中国和韩国观光的日本游客分别为 332 万人和 305 万人;来日本观光的中国游客为 101 万人,去韩国观光的中国游客为 134 万人;去中国观光的韩国游客为 320 万人,来日本观光的韩国游客为 159 万人(《东京新闻》2010 年 8

月23日)。

也就是说,每年仅观光旅游来往于中日韩三国间的游客多达1,350万人。2010年,去台湾观光的日本游客为127万人,来日本观光的台湾游客为108万人,若将此也统计在内的话,一年之内往返于三国之间的游客数量将达到1,500万人。来往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观光游客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其他地区是罕见的。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依然缺乏自由坦诚的沟通,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观光旅行不过是观赏一国的风光景色,品味异国的美食佳肴,或采购所需物品等,与毫不相识的异国人没有直接进行沟通或讨论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妨碍两国人民自由沟通的最大症结还是历史问题。日本只有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才能修复中日关系,才能改善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在济南事件纪念碑前

在韩国江陵大学受到的震动

这里讲述一下几年前去韩国江陵大学访问演讲时的经历和感受。江陵大学位于江原道江陵市，江原道东临东海（日本称日本海），江陵市位于江原道太白山脉东侧的岭东地区中央，东邻东海。日韩争议的竹岛位于东海海域。

2006年5月22日，应江陵大学李相薰教授（现任韩国外语大学教授）的邀请，我去江陵大学访问并作演讲。从首都首尔乘高速巴士横跨朝鲜半岛，大约4个小时抵达了江陵市。高速公路整备得完好，沿途群山连绵，自然景色优美，4个小时的旅行像是轻松愉快的兜风。

我初次结识李教授，是在2004年10月27日韩国外语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李教授从事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是一位富有朝气、勤奋进取的学者。到达江陵市已是中午，在餐馆品尝了当地的美食——牡蛎泡菜，餐后直接去了演讲会场，大约100多名大学生已坐在那里等候。这次演讲的题目是“超越历史”，因为历史问题仍是阻碍日韩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演讲内容大致如下。

日本和韩国之间于1965年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¹⁶⁾，两国政府间“解决”了日本殖民统治及其战争责任问题。但是，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两国国民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日本人没有自觉地认识和检讨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

现在，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¹⁷⁾，这是造成东亚局势不稳定的一大要因。日本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长达35年⁽¹⁸⁾，对朝鲜半岛的分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及日本人检讨和反省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必须通过彻底反省历史，消除日本人潜意识里歧视韩国人的观念。

不仅日本人不能端正历史认识,现在即使韩国人中也依然有吹捧“殖民地近代化”论⁽¹⁹⁾的人。只有澄清和解决这些历史认识问题,日韩两国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外交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建设。

演讲结束之后,到了提问和解答的时间。担任演讲会主持的李教授开始让在座的学生举手提问。就在这时,一位男生站起来用不怎么流利的日语说:“老师刚才提到了构建东亚和平共同体,我非常赞成。主要成员国有中国、日本、韩国,是否包括北朝鲜呢?说实在的,我觉得北朝鲜有些可怕,不过,北朝鲜人毕竟都是朝鲜同胞,将来南北和解,迟早会实现国家统一的。在我看来,比起北朝鲜,日本更可怕、更让人担忧。”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禁不住问道:“为什么你觉得日本可怕呢?”他回答说:“不是吗?现在日本想要放弃和平宪法,为日本拥有军队开路。还有,日本过去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至今大多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地反省历史和战争责任。”

从这位学生的发言我能够感觉到,他十分了解日本国内的现状,看到了日本社会出现的背离和平宪法的动向。他的发言不是反日言论,也并没表现出厌日情绪,但是对日本持有强烈的戒备心。看到日本国内出现的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倾向,担心有可能对朝鲜半岛局势造成新的威胁,这些担忧是极其自然的。韩国许多年轻的大学生十分关心政治和外交等问题,与这位大学生有同感的人想必不在少数。

江陵大学所在的江陵市曾发生过北朝鲜军潜艇渗透事件。1996年9月13日,北朝鲜特种部队乘潜艇渗透至江陵市附近,与韩国军队发生交战,韩国称此为江陵潜艇渗透事件。在这一事件中,韩国军队射杀了13名北朝鲜渗透人员,被韩国军队追捕陷入困境的11名渗透人员服用氰化钾等集体自杀。韩国方面共有17人丧生,其中包

括 12 名军人。

事件后,当时缴获的北朝鲜潜艇陈列在位于江陵市安仁津里海岸的“统一公园”里(潜艇渗透地点)。统一公园内还设有“安保资料馆”,陈列着各种与事件有关的史料和物证。

位于韩国东海岸的江陵市,海岸线非常优美,绚烂的晚霞映照海面,景色十分壮观,成为韩国特有的景观名胜。东海沿岸美丽的松林延绵伸展,从江陵市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非军事区(DMZ: DeMilitarized Zone)(朝鲜和韩国间的隔离区,一个平均 4 公里宽的区域),与北朝鲜可谓咫尺之遥。



在韩国统一展望台

江陵市是震撼韩国的潜艇渗透事件的所在地,且与北朝鲜近在咫尺。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潜艇渗透事件的影响,生活在江陵市的人比其他地域的韩国人在心理上更惧怕北朝鲜。江陵大学那位大学生认为日本比北朝鲜更可怕、更让人担忧,听了他那番令人深思的话,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采取怎样的对中态度

我有两位恩师：一位是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开拓者藤原彰先生，藤原先生患病中躺在病床上完成了《饿死的英灵们》的书稿（大月书店，2001年版）；另一位是引导我对广义上的军事问题产生兴趣的作家五味川纯平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位恩师探求史实的严谨态度和执着精神，一直激励和支撑着我。

藤原先生在中日战争期间作为中尉带兵参与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并在战争中负伤。复员后，他从事军事史研究，着重探讨中日战争的本质。藤原先生根据亲历战场的真实体验，并通过丰富的史料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撰写的诸多著作中，论述了侵华战争对于近代日本国家来说是极为愚蠢、强行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彻底消耗了日本国力的总体战、损国伤民的消耗战。

五味川先生在中日战争期间也曾就任于满铁经营的昭和炼钢厂，痛感日本侵华战争的蛮横鲁莽及惨重后果，为此撰写了《人的条件》、《战争和人》、《虚构的大义》等作品。在五味川先生所著的诸多著作中，我再次重读了《极限状态的人》（三一书房，1973年版）一书，该书的第二部“精神癌症——日本人和对华战争”由评论以及与桥川文三氏⁽²⁰⁾等人的谈话构成，字里行间抒发了作者的内心感受。

五味川先生写道：“正如常说的，对华战争无计划地开始，进而扩大，最终败北。在国民的意识中，也许认为最终是败给了英美，绝不是败给了中国这一既定看法是不会丢弃的。”五味川先生认为，存在于日本人意识中的“绝不是败给了中国”这一确信不疑的感情，是由于对中国缺少“敌”的意识而形成的。也就是说，长久养成的对落后中国的蔑视感，或者说歧视意识，在表现对中国和中国人憎恨之前，对中国只是怜悯感以至于没有萌生“敌”的意识。这里所说的缺少“敌”的意识，产生了南京事件以及“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这

种残暴的杀戮行为。在本书中所阐述的不愿接受“败给了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战后对中国以及亚洲的认识。

在另外一段中，五味川先生写道：“日本就是败给了中国，正因在中国大陆失败，由此也导致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如果日本国民能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历史，深刻地反省那场战争的话，那么我们战后的政治路线和体系必将与现在有极大的不同。”

对“日本败给了谁”这一问题，如果简单地解答为“败给了美国”，而对更深刻的原因加以回避，那么这等同于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因为那只是抹煞和篡改历史的行为。

历史是不能抹煞的。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若不如此，实现中日和解以及取得亚洲近邻国家的谅解将是极其困难的。

不断反省中日战争

近代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轻蔑与歧视观念至今仍未有消除，为了消除日本人对中国持有的偏见和误解，也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反思中日战争。

我认为昭和天皇所持有的中国观以及对中日战争的错误判断，同样也引发了对英美的战争。在与英美开战前后，由于长期与中国作战，加大了对提供战争资源或军需基地的中国台湾、朝鲜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扩充了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的军事占领和统治。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多年来以中日战争为媒介，就有关日本人对中国开战的意图以及所导致的后果，重新进行了探讨和评价。

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后，日本在对英美战争中第一次品尝到战败的苦果。在此次战败之前，从历史的年代表来看，战争的历史可谓连

续不断。

也就是以出兵台湾(1874年)⁽²¹⁾为开端,甲午战争(1894—1895年,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1904—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等一系列对外战争不断上演。其中,还有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5年)⁽²²⁾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涉及义和团事件的出兵北京(1900年)、济南事件(1928年)及出兵山东(1927—1928年)等。

以上这些战争及出兵几乎都是以中国为对象的。以这些战争和出兵为跳板,一直到战败之前,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日益膨胀并不断达成。但是,由于战败,日本通过武力发展的逻辑破灭了。

由此,有必要在追溯这些历史过程的同时,真诚地检讨和反思日本战败的历史事实。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书同时将中日两国政府以及国民看待历史的不同方式和思维观念作为中心题目来加以论述。

为了确认历史事实,需要一定的客观根据,同时又涉及看待历史事实的态度这一难以把握的问题。

即使是从第三者的立场看待历史事实,当关系到个人的生存价值时,也会出于自身的考虑而避开,这样的情况好像并不少见。无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程度如何,由于不愿去加深历史认识,也就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或者有时根本不想从中汲取教训。

所谓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我认为两者应该是表里一体的。在此,再次提出“何谓中日战争”,正是为了通过历史的回顾,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思索。过去以至今日摆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依然阻碍着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关中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课题尚未得到解决。中日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以中日战争为事端引发的。

自出兵台湾开始,经过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²³⁾之后,到事实上两国进入战争状态,进而由于卢沟桥事件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由此演

绎而来的中日战争到底是怎样一场战争呢？对此加以探讨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持续不断，作为日本人应该对这些侵略战争不断地进行检讨和反思。

对侵略战争的检讨和反思应在各个领域进行。但是，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最终导致日本战败的这场战争中，日本究竟是跟谁的战争？败给了谁？确定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且根据现在的观点去加深理解和认识，持有这样一种姿态是极其重要的。日本的战败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发动的一切战争的“败北”。

近代日本所孕育的国家体制以及国民的对外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的轻蔑和歧视，实际上成为国民支持侵略战争的潜在原因。可以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失败都可归结于这样的对外认识，尤其是对中国持有的偏见和误解。

强者和弱者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想再着重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亚洲同盟理论所包含的大陆侵略思想，并没有赤裸裸地提出依靠武力来扩大日本的权益，而是使用了文明、文化等美丽的词藻，以虚伪华丽的外表掩盖侵略扩张的意图。

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以伊泽修二的国语教育为代表的“同化政策”⁽²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自决的浪潮中出台的朝鲜殖民统治下的“文化政治”⁽²⁵⁾等，就是这种典型的事例。

这种做法削弱了日本国民对侵略事实的认识，反而使国民积极地接受了侵略思想，容易被侵略战争的动员所蛊惑。

第二，侵略思想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确定了下来，并被视为提高日本政治地位的根本途径。要与欧美列强进行抗争，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相差甚远，因此，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在

亚洲的霸权地位,以消除自身的劣等感,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

在深感与欧美对抗力不从心时,日本表现出对“强者”(欧美列强)的依存和从属,对“弱者”(亚洲诸国)的侵略和统治。把握这样的对称性(symmetry)虽然十分艰难,但日本仍努力试图保持“国民”精神上的平衡。为了消除对西方列强的自卑感,日本需要对外侵略扩张,这决定了侵略思想的基本构造。为了摆脱来自欧美列强的“威胁”,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路线。恕我直言,这种思想认识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着,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

“大东亚共荣圈”⁽²⁶⁾思想是一个幻想的巨大共同体构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它试图将日本从欧美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却以自己变身为亚洲诸国的“威胁”而告终。对待欧美列强和亚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姿态,体现了日本民族根性中崇拜强者与蔑视弱者的政治文化。

“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不仅是一部分军事官僚和右翼分子高喊的口号,这种思想观念已经深植于日本人意识之中,要消除这种观念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当时,“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怎样在日本人中传播的呢?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1930年生)在《草根的军国主义》(平凡社,2007年)中“大东亚共荣圈的梦幻”一章里,有下面一段记述。

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是,在日本主导下将亚洲组建成一个经济区域,通过发展区域贸易促进大东亚繁荣昌盛。……日本“资源少人口多”,若不创设大东亚共荣圈,移民只能到寒冷的满洲一带,所以必须进一步向南方扩大版图。可这么一来,就必然要和英美对决了,在对华战争陷入泥沼时,就已经有了这种预感。

接下来,佐藤评述说:“大东亚共荣圈”是漂亮的词藻。用华丽的词藻掩饰侵略的本质,这岂不是伪善?可以想象这是个多么虚幻的词语,然而,当时的人们对它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并且,人们以为靠日本的军事实力终究可以实现这一构想,甚至曾一度有种梦想成真的错觉。当时一些日本人看到台湾和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建立

了“满洲国”，开始认为大东亚共荣圈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幻。

我认为，当时的状况与日本现在的状况有某些相似之处，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已经有复苏的趋势。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剖析日本以武力向东亚区域扩展势力的大东亚共荣圈，把促进亚洲和平繁荣作为重大课题。若非如此，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复活的道路，就很难遏制法西斯势力卷土重来。

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大国意识”乃至“帝国意识”，与蕴含着新国家主义要素的各种思潮相呼应，似乎带有和昔日一样的军国主义色彩，一种朝新的侵略思想发展的危险性在日益增大。

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一新兴“大国”视为“威胁”，为了与之抗衡，一边大力追随美国，一边再次企图奉行军事主义乃至军事至上主义，当今的日本社会不正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年代吗？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回顾历史、促进自省。

注释：

(1) 1972年9月29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前文）。
-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第一条）
-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第三条）。（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了开罗宣言中的诸内容应被履行，并且“日本的主权必须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第五条）。

(2) 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尊重基本人

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是日本国宪法的三大要素。

(3)《修改宪法歌》1956年中曾根康弘作词

1

呜呼,溃不成军,敌人的军队进驻

民主和平之名下,强制的占领宪法

策划国家解体,终战之后六个月

2、3、4 段略

- (4) 大东亚战争是指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向英美发出宣战布告以后的战争,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将侵略战争加以正当化,起名为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打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是为了解放遭受欧美殖民地统治的亚洲各国人民。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获得的利益,进一步获得资源和维持战争,确保日本在亚洲的霸权统治。
- (5)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招魂社,1869(明治 2)年为祭祀在明治国家成立过程中因内战(戊辰战争)牺牲的兵士及朝廷官兵创建的,1879(明治 12)年改称靖国神社,一直延续至今。战后,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GHQ)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向日本政府下达了废止国家神道条例,实行政教分离。日本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标志着割断国家与神道的关系(保证信教自由和禁止国家从事宗教活动)。天皇以及日本国务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与日本国宪法第十条相抵触的。并且,1978 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14 名“甲级战犯”被合祀在靖国神社。1985 年中曾根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
- (6)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68 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 (7) 1986 年,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当时的议长是黛敏郎)编撰了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该书被文部省审定为“合格”。该教科书掩盖了侵略战争的事实,对此,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纷纷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历史”。
- (8) 中曾根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984 年提出“为了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以日本人的觉悟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在内阁设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进行教育改革。1985 年文部省通知全国中小学实行“升太阳旗、奏君代之(国歌)”。
- (9) 1937 年 12 月日本军队占领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南京事件是指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据推测,在大屠杀中有 10 多万至 20 万中国人被日军杀害。
- (10) 1937 年 7 月 7 日,驻华日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时发生的事件,中日两军发生冲突。11 日双方曾达成停战协议。然而,日本已于 10 日

决定集聚国内军队、关东军及朝鲜军约 10 万兵力进攻北平。28 日,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日中战争爆发。

- (11) 2011 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 3,449 亿美元(2012 年 2 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记者发表)。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 19.7%,从中国的进口额占日本总进口额的 21.5%;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 7.8%。
- (12) 2011 年,中国的 GDP 为 7 兆 2,981 亿美元,美国为 15 兆 940 亿美元,日本为 5 兆 8,695 亿美元。
- (13) 山东民众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为抵制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以及外国传教士的宣教活动所进行的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1900 年义和团一时占领北京,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宣战,但最终义和团运动遭八国联军镇压。之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帝国主义列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北京设立使馆区,各列强可在中国国内交通要地等驻扎军队。
- (14)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打击沉重。当时工厂相继倒闭,城里到处是失业者,经济危机对农村的打击尤为严重。尽管 1930 年日本粮食大丰收,但因价格猛降,反成为“丰年饥馑”,1931 年愈加陷入穷困的境地,穷人被生活所迫,出现卖儿卖女现象。
- (15) EU 由以下 27 个国家构成(包括 20 个共和国、6 个王国、1 个大公国):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德国、希腊、芬兰、法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卢森堡、马耳他、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荷兰、英国。
- (16) 指日本和大韩民国基本关系条约,美国要求日本与大韩民国(南朝鲜)单独建交,1951 年 10 月,日韩建交预备会议开始。此后,交涉和谈判曾一度中断,历经 14 年之后,1965 年 6 月 22 日,日韩两国终于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然而,围绕条约签订,两国在一些问题上针锋相对。韩国要求清算殖民统治、历史问题,日本方面也指责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将牵涉到强化日美韩军事同盟。另外,该条约的第三条“确认大韩民国政府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这促成了南北分裂,成为日本与北朝鲜恢复外交关系的一大障碍。
-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军队分别对三八线两侧实行军事占领。1945 年 9 月 6 日,南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集聚汉城宣布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但美国不承认朝鲜的独立,1948 年 5 月 10 日,南半部单独进行选举。8 月 15 日,朝鲜半岛南半部宣布成立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同年 9 月 9 日,朝鲜半岛北半部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第一任国家元首金日成)。

- (18) 自 1910 年 8 月 22 日日本和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起,一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为止,长达 35 年的时间。
- (19) 强调日本对朝鲜、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改变了朝鲜、台湾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促进了朝鲜、台湾近代化的历程,宣扬殖民统治的功绩。
- (20) 桥川文三(1922—1983),曾在出版社工作,后任明治大学教授。著有《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
- (21) 1871 年,66 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 54 名被牡丹社乡居民杀害。日本决定借机进行报复,1872 年,明治政府将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划入日本,以被害的琉球人民是日本国民、台湾位于华夷秩序外域(无物主)为由,1874 年 5 月向台湾派遣 3600 名兵士。出兵台湾是明治政府最初的海外派兵(参阅本章及第三章)。
- (22) 1917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如《和平法令》(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割地、不赔款、民族自决),《土地法令》(没收地主的土地,并由农民无偿使用)的文字所示,这是劳动人民的政权。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担心俄国革命波及到本国,出兵西伯利亚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其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最多时达 7 万人),从 1918 年到 1922 年(从北桦太岛撤出是 1925 年),日本参与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 (23) 1931 年 9 月 18 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藉口占领了满洲主要地区。1932 年 3 月建立了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的傀儡国家“满洲国”。
- (24) 即使在台湾人的学校里,也必须采用日语授课,禁止说汉语。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台湾人放弃祖先牌位,改成日本式的。1940 年,殖民政府还公布了改姓名办法,推动废汉姓改日本姓名的运动。
- (25) 日本殖民统治者面对朝鲜爆发的 3·1 独立运动,意识到仅仅靠武力不能征服朝鲜人民,派“稳健派”的齐藤实任朝鲜总督府总督,3·1 独立运动之后,统治方式逐渐转为文化统治。日本殖民者在对朝鲜人民实行镇压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修订了宪兵制度,适当放宽了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目的是为了缓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
- (26) “大东亚共荣圈”被誉为是使亚洲国家摆脱欧美列强的统治、建立亚洲共存共荣新秩序的必由途径,从而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然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拯救亚洲国家,而是把亚洲国家变成日本以战养战的物质资源基地。

第2章

如何对待历史

“反日运动”和“爱国教育”

2005年中国大陆掀起的“反日运动”已成为远去的记忆。2005年3月到4月期间，中国各地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据说这一运动是3月末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学生为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进行联合签名活动开始的。

那时的“反日运动”和2012年8月至9月期间各地发生的“反日示威游行”，虽说表面上看起因不同，但其根源是相同的。两次反日风潮都是对日本政府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以示抗议。不同时代发生的反日运动，其症结都可归结为历史问题。

回顾这些“反日运动”，不禁联想起中日战争前的“五四”运动（1919年）和“五卅”事件（1925年）。

前者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当时是大隈重信内阁）驻华公使向清帝国递交了“对华二十一条”^{〔1〕}要求，这是日本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五四”运动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学生发起的大规模反日运动，要求取消强加于中国的“对华二十一条”，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五卅”事件是针对上海的日本纺织厂施行歧视性劳务管理而引发的一次大众性的反日运动。自日本对中国不断表现出强硬姿态的明治年间起，这一系列的运动屡有发生。以工人和学生为主体掀起的上述两次“反日运动”，是对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具有极大影响的划时代的事件。

自这两次“反日运动”之后，中国民众的对日情感日趋恶化。从“反日”到“排日”，进而到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逐步上升到“抗日”。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在“抗日”的名义下，中国民众投入到打败日本

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

将 2005 年的“反日运动”与中日战争前的反日运动进行比较,也许应该慎重。但是,两者之间总是有些因果联系的,一般认为中日战争前培育起来的中国人对待日本的情感仍会通过某种行动表现出来。

问题是,现在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对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和心灵的创伤无所顾忌、不加体谅。比如,此次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发了中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对此,日本国内有种流行的说法是,此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国内惊人的经济发展加大了贫富差距,对此一部分怀有积怨和不满的人受到煽动掀起了“反日”游行,说这是为了搁置中国国内的诸多矛盾,中国政府策划的“官制游行”。

这样的言论虽说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只将责任推卸给对方就不能看到事态的真相。也有日本媒体以及许多知识界和评论界人士发表评述,他们批评说,中国的“反日暴动”是中国人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推行的所谓“爱国教育”的结果。

“爱国教育”是中国政府为唤起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而实施的一大政策,通过展示和学习抗日战争胜利等历史事实,更好地唤起中国人的新的国家意识。总之,通过不断加强历史教育来统一历史认识,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国和日本一样,都使用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日本称为审定教科书,实质上是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中国教师用的指导书明确标示,“使学生学习抗日战争英雄们的爱国精神”,达到“爱国教育”的目的。我认为,硬是把“爱国教育”和“反日教育”结合在一起,多少是牵强附会的。

那么,发生“反日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把“反日运动”或者“反日示威游行”指责为中国国内的问题不过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有分析认为,此次中国各大城市发生的反日示威游行,参加者多是普通的城市市民(中间阶层),也有些来自农村的民工,以及中国称之为“待业青年”的失业青年(《不安定的民族主义时代》)。这种片面的分析,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国内的问题。

针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中国青年表现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中国各地掀起的反日示威游行的真实背景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中国和韩国一样,城市青年中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网络社会,青年们通过互联网就广泛多样的话题进行大胆的交流⁽²⁾,官方媒体单方面的报道已不能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变化的国民意识

近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自身以及周围的人渐渐变得富裕了,这是有目共睹,并且可以感受到的。即使国家不进行教育,中国人的自尊和国家意识观念自然也会不断地增强。许多现代青年开始有了大国意识,同时他们又承受着诸多矛盾和生活的压力,通过发达的电子网络相互联结,形成了以青年为中心的网络舆论或者网络社会。

中国加大了与日本、欧美的经贸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饱受诟病,贫富差距的扩大、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对此,与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应负有相应的责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极其密切,如何把握与日本的关系,保持怎样的距离,可以说是中国青年面对的难题。虽然中日关系极其复杂,但又不能采取暧昧的态度,面对日本,面对日本人,许多中国青年人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

中日之间最大的悬案可以说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由于重视两

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关系，历史问题一直被搁置了起来。近年，中国青年们果断地推开历史问题的大门，要求日本反省侵华历史，希望从被害意识中解放出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开始重新考虑过去一直优先于一切的与日本和欧美的经济关系。

在这一动向中，中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关心突出地表现出来。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方面只是口头上反复表示谢罪⁽³⁾，却不愿真诚地对待历史，中国人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这种不反省的态度，感到不满或愤慨也是极其自然的。也就是说，由于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不能以明确的态度评价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国青年按捺不住愤慨和不满情绪，通过“反日示威游行”的形式表示抗议。

中国的年轻人有时指着日本人说“小日本”，我认为这绝不是像过去那样带有污蔑性的感情表现。不过我觉得，在他们结合历史问题说出“小日本”时，其中感情上总还是隐含有不满以及愤怒的一面吧。

近年来，我每年去中国访问或讲学，有很多机会与中国的大学生及学者进行交流和沟通。我深深感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即使打开了形式上的封闭状态，仍然尚未达到真诚地敞开心怀进行广泛讨论、交流的程度。当然，双方之间未能达到自由广泛的讨论交流，是由于两国存在各自的情况及诸多原因，其中历史问题是最大的窒碍。

历史认识的差距难以缩小

如前所述，针对以中国青年学生为主进行的“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有日本媒体和舆论指责说是中国开展了敌视日本的“反日教育”的结果。在此所说的“反日教育”，大概是指1995年以后中国政府着力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吧。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1981年2月25

日，以全国总工会为首的9家团体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开始面向青少年积极开展“五讲四美”活动。

所谓“五讲四美”活动，简言之，就是为了让青年获得良好人格而提倡的口号，同时结合进行的还有“三热爱”运动。1983年3月11日，中国政府成立了以万里（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为主任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

后来增加的“三热爱”的内容，是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在此，作为提倡“三热爱”的基础，大加宣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7月）到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1945—1949年）中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直至建立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这28年间的历史。

其中，着重强调的是，自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宣传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是赢得人民信赖的政党。中国政府宣传抗战胜利，主要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

1994年8月23日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共8项40条）对于了解中国进行“爱国教育”的目的是极为重要的。纲要中强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人民日报》1994年9月6日）。

以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主，在侵华日军残害中国人的现场，建立了各种规模不同的战争史料馆和纪念馆，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如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露731细菌部队暴行的哈尔滨“罪证陈列馆”等。

我去中国访问期间，参观了许多有名的战争资料馆，深深感到这些战争资料馆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色彩。在总结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经验时，中国政府着重强调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旗帜，是击败侵略者的最重要因素。这些资料主要向人们展示，抗日战争

运用了各种战略战术,是借助地利人和,用全民战争、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式击败了入侵者。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远继承和发扬的财富。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着一些内外矛盾和困难,为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另外,这些战争资料馆的布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展厅有“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字样,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直接针对日本的批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以弘扬爱国精神为主题,增强民族凝聚力,齐心协力去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矛盾和困难)。

这些设施被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组织群众进行参观。目的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正是通过全国上下共同抗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才能获得今天的建设成就。

在中国,宣传中日战争的历史成果对于提高中国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极大的意义。这种宣传教育活动并不是引发反日感情的原因,其本身也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图。

日本的媒体热衷于将“反日示威游行”和这种“爱国教育”联系在一起,否定和批判中国以宣传抗日战争胜利为主要素材的“爱国教育”,对此中国方面是不可能接受的。

换句话说,日本指责中国政府通过“爱国教育”煽动反日情绪,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一致对外,日本方面的这种反应和批评论调,说穿了只不过是自身不反省战争责任、又不愿触及历史事实的行为找辩解罢了。

其中,也有些评论指出,中国方面进行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见得唤起国民发自肺腑的理性爱国热情,或许会引发“反日”“排日”情绪等,掀起爱国反日思潮。也就是说,尽管“爱国主义”教育的宗旨是好的,但是过度的悲情式爱国主义教育有可能导致国民的仇日心理。

在此,想介绍一篇中国媒体发表的有关中国青年对历史认识的评论。这是《中国青年报》(1995年7月17号)刊载的马少华撰写的题为“历史与我有何关系?”的文章。该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日报),据说发行量约达75万份。

介绍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片段。

当一位中国少年被问及日本侵华战争而一脸茫然时,在大海那一边的岛国,却有人用教科书告诉孩子们那叫作“进入”。在一国忘记了历史的年轻人与一国接受了伪历史的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交往、理解、竞争该如何进行呢?

也就是说,这是存在于中日两国青年中的忘却共同的历史或者偏离历史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中国青年忘却历史和日本青年歪曲历史。由于对历史的忘却和歪曲,当然无法达成相互加深历史认识的目的,历史认识的差距终归难以缩小。

“一个人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完全地意识到自己,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我认为这句话充分表达了马氏撰写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

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正确地记忆历史事实是最根本的前提。我们总是不断地去重复记忆,又不断地忘却,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了。但是,历史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自觉地去记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忘却和歪曲历史,就等同于自我放弃意识自己的机会,用马氏的话说,这就是忘却“民族精神”。

看了马氏的文章,令我想起过去常常被引用的原联邦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的一句名言,那就是:“看不到过去的人也就看不到现在。”⁽⁴⁾

魏茨泽克总统的名言,不是就一般历史观而言的。那是向着对

纳粹的犯罪及德国过去的历史渐渐漠不关心或者熟视无睹的德国青年所说的一句话。那是面对在德国日益扩大的赞美纳粹之声,以及对土耳其移民等抱有敌意的德国国民,谏诤排外民族主义、促进自我反省的警言。

现在,中国政府之所以推进“爱国教育”,也许正像马氏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过去的历史渐渐淡忘了。正是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中国将开展爱国教育作为培养青少年一代加强历史记忆的基本措施。

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与此相对,日本人不断做出否定或歪曲历史的行为,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认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对日情感的复杂化

从电视上看到2012年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后,我思绪万千。中国的年轻人成为反日游行的主力,其中许多人是响应网上号召加入了游行示威行列。

据说,现在中国大约有5亿3,800万人利用互联网,携带手机的人超过4亿。特别是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中,互联网利用率高达90%以上。这次示威游行也同样,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示威活动一下子波及到了全国。中国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网络舆论或网络社会,网民呼吁各大城市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

例如,早在10年前就有报道指出,号称中国规模最大的新浪网,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正式见解更为激进,对日批判态势鲜明(刘志明:《中日传播与舆论》EPIC、2001年版)。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该网站的舆论也不能无视。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发行的报纸《国际先驱导报》

刊登了题为“朝日啤酒等企业 与历史教科书事件有关联”的报道(2005年3月28日),报道内容可以在网上浏览,这自然引起一些网民对日本企业产生反感。根据我个人的感觉,现在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感情绝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曾一贯寻求国际支持,日本国内媒体和民众热烈响应。实际上,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很低。即便是日本的这一愿望能够实现的话,也不应该将其视为国际社会宽恕了日本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

另外,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以历史认识和对历史的解释并非千篇一律为由,日本一些政界官僚善于采用对自身有利的解释,就历史问题不断进行辩解。历史解释并非是一元的,而是具有多种立场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双方应在相互认同这种多样性的情况下,为达成共同的历史认识做出不懈的努力。

的确,中日两国看待历史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方面为使国民形成共识,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对于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历史认识模糊、轻视历史的表现感到不解和不满。如果日本政府能够真诚地对待历史问题,认真汲取历史教训的话,对中国的态度也将会有极大的转变。

近年,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也呈现多样化,对于政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成就,宣传抗日战争的成果,也并非百分之百地赞同和接受。但是,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决不希望苦难的历史重演。正是为此,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以今后的中日关系为重,中国政府放弃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

中国政府主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是为了日本的战后复兴,为使日本人民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将日本建设成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同时也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那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政府希望日本能够正视历史,为促进和平做出切实的努力。对于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在中国看来,日本的所作所为背离了中日友好的原则,背弃了和平主义的基本原则。

几年前,我曾去南京访问,参观了在南京市内13个场所建立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纪念碑。河海大学校园内建造的“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上镌刻着“居安思危”,那四个大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警示我们在和平年代也不能忘却战争的悲痛历史,牢记“居安思危”。我还多次访问过旅顺203高地景区,在景区周边的标语牌上写有“勿忘国耻,牢记历史”。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当时的英领地马来亚)参观战争遗址和战争纪念馆时听到过“Forgive, but not Forget”(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却)。尽管言语表述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尊重历史,铭记历史。这与日本歪曲历史、抹煞历史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何设置战争史料陈列馆?

韩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把历史科目纳入必修课,让青少年学习和了解韩国民众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历史。首尔郊外建有规模庞大的独立纪念馆,还有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这里曾经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关押大批政治犯的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内设有蜡像馆,用人物蜡像及刑具模型真实再现了爱国志士遭受日本警察盘问拷打的情景。

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已经成为韩国人缅怀革命先烈,学习独立自主精神的历史课堂。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可以进入各展厅参观,韩国爱国志士遭受拷打和酷刑的场面惨不忍睹,我甚至感到,不该让

儿童参观那些极其悲惨的场面。我不反对如实地再现历史的真貌，但是，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毕竟有限，孩子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过早地对孩子进行悲情式爱国主义教育，未必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几年前，我曾带着我指导的日本学生及留学生去韩国参观了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当时，正好遇到了韩国小学生参观团体，我们随在其后一起入场参观。我们一直随在小学生团体的后面，当进入蜡像馆看到日本人残酷拷打韩国人的场面时，一个女孩子突然转过脸来盯视着我，目光非常严厉，那种神情难以用笔墨形容。也许她看出来我是日本人，尽管女孩子并不是憎恨我，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这样的“日本人”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愤怒。

这也许是我自己过于敏感，不过，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至今有过多次这样的体验和感受。这之前也是去韩国访问的时候，早上到首尔塔洞公园散步，看见拿着扫帚清扫公园的大妈，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我本想用韩国语跟她打招呼，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也许对方从我的衣着外貌判断我是个日本人，所以投过来那种异样的目光。这里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掀起三一独立运动（1919年3月1日在塔洞公园发表独立宣言⁽⁵⁾）的现场，此次反日独立运动遭到了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大批爱国志士被捕、惨遭杀害或被迫流亡国外。塔洞公园大门右侧立有铭刻独立宣言的巨大石碑，在这种掀起反日民族斗争的场所，多少感到一种肃穆、深沉的氛围。

在韩国参加学会时，我曾向韩国同行谈起了自己在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的经历和感受，大家曾就历史馆的展示方式及目的展开过议论。对此，韩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同行也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几位韩国朋友略带沉重的语气说，韩国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对青少年加强近现代史教育，这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状是很难改变的。

其实也并非一定要通过设置陈列馆再现一个个历史场面。但是，通过见证历史，可以使人们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如果完全取消了这些历史教育的场所，将会是怎样

的呢？这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回顾和记忆韩国人民饱尝殖民统治的苦难历史，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在这一方面，中国是通过宣传抗日战争的历史功绩，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中国和韩国采取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相似的。日本也同样，自近代开始，日本将为国献身的英烈合葬祭祀，通过靖国神社和附属史料馆（游就馆）的展示^{〔6〕}，颂扬“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向国民宣传侵略战争及忠君爱国和为国献身的精神。

另外，中国各地设置了大量规模不同的战争资料馆，实际上其中有一些被称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着加强历史学习和爱国教育的功能。日本国内没有形成中小學生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目前也尽量控制在任的内阁大臣去参拜。但是，日本国民普遍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战争期间极力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毒素还没有彻底清除。

靖国神社是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战后至今靖国神社持续地发挥着政治功能，这必然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谴责。

将韩国人民参观韩国独立纪念馆、西大门刑务所资料馆，以及将中国人民参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与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相提并论，显然是不慎重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是忘却历史的行为，必将受到亚洲人民的谴责。然而，其中共同的一点就是双方都在不断加强历史认识，而日本是在继续强化错误的历史认识，显然，这是与亚洲人民的愿望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

因此，双方之间存在的历史认识的差距是难以消除的。尽管设置战争史料馆等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设施起到了使双方历史认识差距扩大的作用，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

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冥思

2010年9月18日,正值满洲事变79周年之际,我访问了位于沈阳市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该博物馆由1991年开馆的旧馆和1999年9月18日开馆的新馆构成。旧馆是一座残历碑式的建筑物。与各地的历史博物馆相比,“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建筑规模更加宏伟壮观。沈阳是满洲事变(1931年9月18日)的发生地,这一事件又标志着中日15年战争(1931—1945年)的开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建成的。

亲临这样的场合,我更能体谅和感受到中国人民复杂的对日情绪。我所接触的中国的学者及大学生,他们都真诚地希望和日本加强交往,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与此相反,日本人对中国抱有高度的

戒备心,由此产生很大的反差。近年,在关于“天外天”海底天然气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等问题上,日本国内的许多动向,影响着中国人的对日态度——融合论和警戒论交替变换。

此次沈阳之行,我应邀参加了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纪念仪式。这里每年9月18日,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纪念仪式,人们悼念“九一八事变”后牺牲的先烈,将历史铭刻心中。参加纪念仪式的有当地的大中小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一般市民,整个会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

场庄严肃穆。在历史博物馆外面有许多沈阳市民站立在道路两旁。纪念“九一八”之时，市民的心情是沉重和复杂的，也不排除对日不满情绪或仇日情结，为了确保会场秩序、防止意外，许多武装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和戒备，这与以前到这里访问时的气氛截然不同。

晚上9点18分，沈阳城区上空响起了长达3分钟的警笛。当时我站在队列的最前排，最前排只有我一个日本人，作为加害国的一员，我与许多受害者的后代站在同一队列，心情沉重，思绪万千。警笛声响彻夜空，我紧闭双目，不禁再次扪心自问：究竟何谓中日战争？

“九一八”纪念仪式会场集聚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或许他们事先知道有一个日本学者参加仪式，许多摄像镜头对着我拍照。在这样的纪念仪式上，竟会看到一个日本人闭目悼念的身影，有些人甚至显得困惑不解。

纪念仪式开始后，出席仪式的沈阳市政府官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先后上台讲话，号召人们牢记“九一八”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更加紧密地团结奋斗。这些讲话内容并未提及“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策划的，并由此导致了中日15年战争这一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没有明确指责挑起事端的加害者日本。这也许是考虑到现在的中日关系，或者说表现出高度的自制性。贯穿纪念仪式的主题是，强调中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而不是批判加害者一方。

纪念仪式结束后，我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采访。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我参加纪念仪式的感想、对“九一八事变”及中日战争的评价，以及今后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建议等。两个月前，我也曾接受过CCTV的专访，那是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满洲事变80周年策划制作的一个节目，其中，包括对几名研究近现代史的日本学者进行专访的内容。当时，电视台3名制作组成员专程来到日本我任教的大学，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记者特别关注的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对中国及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及其背景，日本人对侵略战争所持有的态度。对于这些问题，我从日本幕府末期

的开国起步到满洲事变为止，结合日本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作了详细的说明。

制作组的采访记者曾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近代史有所了解。他非常想了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及背景，而不是单纯地评价侵略战争本身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与以往批判日本侵略战争的节目不同，这次主要以探求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为主题，正视日本侵略战争这一负面遗产，期待着这次报道方式有新的转换。

“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9月17日，我到位于沈阳市的东北大学讲课，同时也接受了其他当地电视台的采访。电视记者来到大学，录制了我授课的情形以及回答学生提问的场面。听讲的主要是该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通过授课及交流，从他们的言谈和提问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日本非常关注，也非常友好。在大学与师生交流的热烈场面与第二天“九一八”纪念会场的气氛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正值满洲事变纪念日，中国称之为“国耻之日”。当时，很多市民集聚在历史博物馆前，为了入馆参加纪念仪式，我不得不在旅馆等候待命，最后还是跟随沈阳市政府的先导车进入了纪念会场。

9月18日之后，中国的电视台播放了上述的采访节目。在“九一八纪念馆”的采访中，我主要强调：中日两国人民为消除历史认识上的差距需要做出努力，关键是日本必须承认历史事实，对侵略战争不只是口头谢罪，而是要拿出诚意和切实的行动，为达成历史和解做出不懈的努力。

2011年暑假，为了收集史料我再次去长春和沈阳访问，CCTV的制作组得知后，提出来借此机会再次对我进行采访，时间和地点可以根据我的方便来定。我选择了与日俄战争有关的旅顺，我的中国朋友郭富纯先生任旅顺博物馆馆长，采访地点就确定在旅顺博物馆。8月28日，CCTV制作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采访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CCTV的青年记者提出许多有关日本近代史方面的问题，他那种认真坦诚的姿态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年11月5日,我到北京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时,再次与 CCTV 制作组的人员见了面。他们告诉我说,前两次的采访节目早已制作完成,只是何时播放还不能确定。制作好的节目未能如期在电视上播放,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涉及日本学者的访谈内容,尚未通过审定?抑或是电视台担心国内电视观众的反应?总之,节目制作后一直未能公开播放,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于涉及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访谈内容,似乎表现得极其谨慎小心。

是否能达成历史和解?

2011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人民日报出版社举行的记者访谈会。2010年10月,我撰写的《我们的战争责任》(凯风社,2009年出版)中文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认识和历史和解为主线,论述了战后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极其淡薄的问题。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人民网》等多家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这些记者几乎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本来预定记者访谈会的时间为1个小时,记者们接连不断地提出了许多问题,结果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事后,各报刊上刊载了此次记者访谈的内容,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可以从互联网上阅览。

记者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日本国民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极其淡薄?中日两国由于战争体验不同,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自然有差异,如何克服这种历史认识上的差距?以及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如何达成历史和解,更好地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等等。

两天后,中国电视台播放了此次采访的内容。对于一个日本历史学者论述的战争责任及中日两国人民历史认识上的差距,中国的

电视观众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历史认识的差距正是阻碍两国人民达成相互理解、实现和平共存的要因。这次会见记者时，我顺便向记者透露，我撰写的另一本《何谓中日战争》（中文版本）不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通过历史纪实对中日战争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评价。

说起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认识上的差距，令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经历。

2008年4月初，正值春假，我偕妻子和女儿去大连，再次顺便参观了位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在馆内参观时，意外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我和家人并排参观资料馆的陈列品，从后面进来一个中国人参观团体，其中，有人冲着我们气势汹汹地问：“为什么这里会有日本人?!”

从那说话的方式和态度表露了被害者内心的情感。一时间充满了紧张、沉重、郁闷的气氛。当时我忍不住想回答说：“正因为我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所以才来到战争的现场来重新认识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

历史。”正在这时，馆员和陪同我们参观的中国人为打破这异常紧张的气氛，马上走到我们中间说：“这里的展览不单单是为中国人的，也是为日本人不忘记历史而设立的。”

也许是接受了馆员的解释劝说，对方没再说什么。我望着远去的参观团体的背影，禁不住再次深深感到，不仅中国人需要确认和记忆被害的事实，我们加害者也有必要在同一现场接触加害事实，并将此铭刻在心。

无论是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只要将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事实铭刻心中，我相信两国历史和解的大门必将会慢慢地打开。

“世代友好、永久和平”

这也是几年前我去中国访问时的一次经历。2008年9月，我去参观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众所周知，该馆是在原731部队本部大楼的遗址上建成的，这儿曾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制造开发的现场。“罪证陈列馆”内大量的物证、实景，向人们揭示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该馆的一位女副馆长陪同我一起参观，参观结束后，她问我有何感想，并要我写点什么以便留作纪念。我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对方突然要我谈感想和留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世代友好、永世和平”八个大字，瞬即将它作为留言写了下来。在我写留言时，不知什么时候，我身边围过来许多人观看，他们都是来参观展览的中国人。

看到我身边聚集了那么多围观的人，副馆长趁机说：请把留言的意思和感想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站在围观的人群中，就好像临时举办一场小型讲演会。首先，我以沉重的心情，加重了语气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就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表示谢罪。

任何时候都不能歪曲、否定和篡改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将历史如实地传承下去是我们现在以及未来应负的责任,在我看来,也就是日本国民世代应该负有的战后责任。同时,我还强调:日本国民中有很多“和平市民”,他们铭记历史的教训,期盼着实现真正的和平,为维护和平宪法做着不懈的努力,也非常珍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听众热烈地鼓起掌来。紧接着,有些人走过来要和我合影留念,一时间有些应接不暇。尽管接下来还要赶到别处,时间安排得很紧,面对那么多热情友好的观众,我忘记了时间,和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一一握手,合影留念。那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深深感到:很多中国人都是非常宽厚坦诚、热情友好的,他们愿意和日本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侵略中国的起点

在步入近代国家方面痛感落后于欧美列强的日本,于1889(明治22)年2月11日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自此,改国号为“大日本帝国”,这便是所谓的“帝国日本”的登场。

日本于1895(明治28)年4月17日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与清政府缔结了和约,清政府向日本交付2亿两白银的赔偿金(相当于当时的3亿日元),并将清帝国的领土台湾及澎湖诸岛等割让给日本,由此日本成为殖民地领有国。而早在明治宪法公布之前,也就是15年前的1874(明治7)年,日本就已经发动了对外战争。那就是明治政府最初的海外派兵——出兵台湾。

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是这样的:

出兵台湾的前一年,即1873(明治6)年8月3日,当时任明治政府参议的西乡隆盛⁽⁷⁾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请求内阁决定向朝

鲜派兵的意见书。8月17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西乡的意见书,但条件是要等正在国外考察的岩仓具视一行⁽⁸⁾回国后再付诸实施。

西乡提出的向朝鲜派兵的意见书,以及围绕所谓“征韩论”的争议,彰显着权利斗争的内情⁽⁹⁾。同年1月,日本实施了以全民皆兵为主要内容的征兵制⁽¹⁰⁾,由于担心在军事部门的独霸地位有崩溃之虞而竭力反对的武士家族,希望把朝鲜作为自己炫耀武力的舞台。欲借实施征兵制建立近代军队的势力,和力图维护武士阶级利益的势力之间产生了对立。

前一种势力试图通过中央集权制来实现近代国家的构筑,在其看来建立政府直辖的强大的近代军队是极其必要的。而后一种势力则担忧在加速近代化的过程中将失去既得的利益。

为了避免与中国(清帝国)和俄罗斯,乃至欧美列强发生摩擦,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有实力的参议员对出兵朝鲜持反对态度。西乡隆盛因“征韩论”失败辞官返乡,出兵朝鲜也无限延期。明治政府成立不过6年,就围绕海外派兵展开了激烈的权势斗争,其意义非同小可。

出兵朝鲜的计划落空,取而代之的是强行出兵台湾。

1874年5月17日,西乡隆盛的胞弟、担任陆军中将领的西乡从道⁽¹¹⁾率领3600名兵士,抵达了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附近,并于5月22日在牡丹社乡登陆。这一事件成为明治政府最早的向海外派兵的标志。

关于出兵台湾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居住在台湾南部牡丹社乡的台湾岛民(排湾族:Paiwan族)杀害了漂流到此地的琉球渔民,由此引发了日本国内要求实施报复的行动。另一说并未否定这一事实,却把事件原因解释为牡丹社乡岛民救助了因台风漂流此地的琉球渔民,并提供食物等照顾,但由于双方未能很好地沟通引发了悲剧。

不论琉球渔民被害事件的细节如何,最大的问题是,此事被早就

图谋出兵海外的势力视为良机，西乡从道趁机率领 3600 名拥有现代装备的日军入侵该地，杀害了许多当地居民。

出兵台湾的背景，隐藏着明治政府企图把清帝国的台湾霸为己有的野心。事实上，在出兵台湾 10 年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如愿以偿地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领土。

早在明治政府刚成立时，日本就对台湾怀有野心。后来只不过是找借口使侵略正当化，将侵略战争冠冕堂皇地解释为“正义的战争”。明治政府最初的海外派兵——出兵台湾，就是采取了以日本侨民在台湾惨遭杀害为借口向台湾派遣军队的侵略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清、日俄战争等明治期间对外战争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不得不承认，从出兵台湾直至 1895 年 6 月 7 日日军占领台北，对于这期间日本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的研究成果可谓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收集十分困难，另一个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对亚洲外交政策强调日清、日朝关系（1871 年日清友好条约、1876 年日朝友好条约），缺少单独从日台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人们往往将日台关系史视为日清关系的内容或展开来把握，没有对日台关系及台湾发生的历史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

战后日本的历史学，一般将甲午战争看作是“日本最初正式的对外远征（海外派兵的第一步）”，忽略了出兵台湾的历史。忘却出兵台湾的历史，这本身就意味着日本不能深刻地反省侵略历史，是历史认识极其浅薄的表现。

我一直抱有这样的认识，不断探讨出兵台湾的意义。2004 年 11 月 24 日，在台湾屏东县牡丹社乡召开了考察牡丹社乡事件的国际会议，我应邀参加大会并作了报告。

国际会议期间，我去了排湾族居民与西乡从道率领的 3600 名日军进行拼死决战的场所，在那里徘徊良久，陷入沉思。没有现代化的



牡丹社事件碑

武器装备,仅仅持有极少量的土枪及弓、刀的排湾族人,面对具有现代装备的日军,英勇不屈地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终因力量对比悬殊,排湾族居民无法抵挡拥有现代装备且严格组织起来的日军大部队,多数人惨遭杀害。

这是现代军队对于中世纪式的民间武装的格斗状况。不难想象,由于双方战力极其悬殊,自然是一边倒的屠杀。在报告会的会场上,有当年参加抗击日军的排湾族的后裔,他们很想知道,在这一场合来自日本的历史研究学者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他们听得十分认真,唯恐遗漏掉什么。

牡丹社乡事件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排湾族的后裔一直忍受着祖先惨遭屠杀的极大屈辱。历届日本政府,包括战后的日本政府,从不提及这段悲惨的历史,也没有公开表示过谢罪,这使排湾族人民感到无比失望、无比愤慨。即使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回归中国之后,他们的祖先遭遇的这一民族灾难也没有被台湾政府视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至少,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执政时期,作为不值得一提的事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从现在的动向来看,台湾开始重视本地固有的文化和历史特性,对少数民族的存在价值和民族特性重新进行评价。排湾族人民终能将洗刷耻辱,将先祖抵制外敌入侵的英雄史载入台湾史册。

表明谢罪

在这次牡丹社乡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冲绳大学教授又吉盛清先生作了主题演讲。又吉先生长期从事日本出兵台湾问题的研究,多方收集史料并进行分析,同时还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到台湾访问,为澄清出兵台湾的历史真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又吉先生总结了以往研究考察的成果,在主题演讲的最后,他以十分诚挚又沉重的语气说:过去日本军队袭击排湾族部落,给排湾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在此我要向大家表示“谢罪”。又吉先生表示谢罪的发言出乎人们的预料。本来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沉重,听讲的排湾族的后代个个神色严肃,又吉先生最后表示谢罪的话语,好像缓解了会场内颇为紧张的气氛。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以严谨的态度探究历史真相,从中汲取教训,并以实际言行和诚挚的态度向受害者表示谢罪,这种姿态是何等的重要。又吉先生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他以表示谢罪结束了主题演讲,一时间会场上变得极其肃静。接下来轮到我上台讲演时,大家似乎才开始反应过来,一起热烈地鼓起掌来,排湾族的代表还走到又吉先生面前,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台湾原住民惨遭日军杀害,这一事件过去 100 多年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从未正式地向台湾排湾族人民表示过谢罪。通过民间交流活动,相互展示历史研究成果,同时面对受害者表示真诚的谢罪是极其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应该通过大力开展民间交流活动,敦促日本政府及固守错误历史观的日本政客反省历史、承认历

史真相、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

2007年6月4日,我再次访问了牡丹社乡。此次是为出席一个吁请建立牡丹社乡事件纪念公园以及纪念碑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也邀请了台湾“立法院”的议员们出席,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集聚一堂,大家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

在讨论会上,我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指出牡丹社乡抗击日军入侵事件本身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排湾族人民对近代日本进行霸权扩张的反击,

他们的英勇行为谱写了近代抗击外侵的光辉一页。我还结合1945年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的事实,强调了实施暴力的国家最终必将走向失败。



在台湾牡丹社乡

帝国主义和文明化

在牡丹社乡举办的这次研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日本称为“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乡事件在日本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我认为,正是以出兵台湾为契机,明治政府步入帝国主义之途,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因此,有必要深刻地把握1874年强行出兵台湾以及1895年占领台湾的意义。

关于如何把握出兵台湾与甲午战争时期军事占领台湾的关系,我还通过分析“脱离华夷秩序⁽¹²⁾”和“加入万国公法秩序⁽¹³⁾”,进行了具体的解说。

我认为,无论是出兵台湾还是占领台湾,都是通过“文明化”的说

辞掩盖了侵略性、排外性。同时,由于强调出兵政策和占领政策的正当性,可以由此验证明治政府或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本质,以及“近代化”所包含的负面因素。

通过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言论及对甲午战争的评价,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日本侵略思想形成及发展的过程。在出兵台湾以及占领台湾中所采用的手法,后来成为日本帝国获得殖民地和强行实施扩张政策所采取的惯用伎俩,也成为战后日本人在对台湾认识方面梳理不清、有悖历史事实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战前许多日本人认同了这种在台湾推行“文明化”的政策,自发地支持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战后,日本人依然没有从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两点。第一,在战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中,对出兵台湾以及占领台湾并没有进行定性评价。一般人的认识,只不过停留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台湾殖民政策推进有序等表象上。加上战后台湾人表现出的“亲日感情”,因此想要认定日本侵略台湾的历史事实并追究日本的殖民统治责任,实际上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日本研究者没有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历史,也就不能够对侵略罪行进行彻底的追究。

第二,应重新探讨明治政府形成过程中“文明化”的意义。“文明化”在促进国内现代化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了对外扩张,必须将殖民地的人民视为“野蛮人”或者是启蒙的对象,将推进“文明化”视为大和民族的高尚使命。

所谓“文明化”,是指“文明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对“非文明者”或“非文明地域”的传统习惯和制度进行破坏和改造。这种“扩张文明”的本身是践踏、破坏对方固有的历史和文化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异质文化的践踏和破坏,大多情况下是靠强制手段,通过实施暴力达成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明化关系到对异质文化的肆意践踏或破坏。这与现在打着国际化的旗号,排除异质文明和

民族习俗,推进同质化、标准化的状况极其相似。

注释:

- (1) “对华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第一号(四款),是关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德国权利的要求;第二号(七款)要求将日本在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以及南满铁路的权益延长 99 年等;第五号(七款)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中国警察由中日合办等,这些条款内容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
- (2)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非营利的服务和管理机构)2012 年 7 月发布的统计报告表明,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5.38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88 亿。
- (3) 1995 年 6 月 9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以历史为教训,再次决心走和平之路的决议”(战后 50 年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众议院在战后 50 年之际,向全世界的阵亡者以及战争牺牲者,表示诚挚的哀悼。而且,回想起世界近代史上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本国认识到过去所做的行为给他国国民,尤其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在此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对过去战争的历史观的分歧,谦虚地汲取历史教训,致力于构筑和平的国际社会。

众议院在此表明,日本决心在日本国宪法提倡的永久和平的理念下,同世界各国携手,开创人类共存的未来。

战后 60 年决议(2005 年 8 月 2 日众议院决议)内容节选如下:

……我们要记住 10 年前“以历史为教训,再次决心走和平之路的决议”,深刻反省我国在过去一个时期给亚洲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深重苦难,向所有牺牲者再次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悼念。

日本作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国,日本政府应该在日本国宪法提倡的永久和平的理念下,同全世界人民一起,寻求废除核武器,回避战争,结成世界联盟的道路,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竭尽全力。

- (4)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20 年 4 月 15 日出生。1984 年起担任联邦德国总统。这是他在 1985 年 5 月 8 日联邦议会上发表演说时说的一句话。
- (5)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日本殖民者通过所谓的“土地调查”,强制掠夺朝鲜农民的土地,农民生活穷困不堪。不愿当亡国奴的朝鲜人民纷纷起来抗争,抗日救国的“义兵斗争”遍及全国。另外,受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及“民族自决主义”的影响,朝鲜人民的反日运动日益高涨。1919 年 3 月 1 日,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朝鲜民众集聚在汉城的塔洞公园,高呼“独立万岁”,进行示威游行。三一运动迅速扩大为席卷整个朝鲜半岛的反日起义,至 5 月末参

加人数达 200 万。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下,三一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场运动中,朝鲜民众共有 7,500 多人被杀害,约 16,000 人受伤,约 47,000 人被捕。

- (6) 游就馆位于靖国神社的东北角,馆内陈列着战争遗物、资料和武器等。其中,有女子挺身队血染的日章旗、4,800 名战死者的照片、“彗星”轰炸机、零式 52 型战斗机、回天人操鱼雷、樱花炸弹、机器人特攻机、九七式战车、泰缅铁道通车时的第一辆蒸汽机车 C56 等。
- (7) 西乡隆盛(1827—1877),出生于萨摩藩(鹿儿岛),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的政治家。1873 年主张征韩论,因提案未被采纳而辞去官职。1877 年在西南战争中战败自杀。
- (8) 岩仓具视(1825—1883),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公卿、政治家。1873 年击退征韩派,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岩仓使节团对美国、欧洲诸国的长期出访(1871 年 12 月 23 日—1873 年 9 月 13 日),是日本与西洋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这个大型考察团由政府要员及留学生等 107 人组成,岩仓具视是考察团的总负责人,被委任为“特命全权大使”。
- (9) 自 1868 年明治政权建立开始,农民暴动如火如荼。戊辰战争后需要整顿混乱的政治形势,诸藩财政状况困难,同时面对欧美列强侵入的危机,在此状况下“征韩论”者提出了征服韩国的必要性。围绕“征韩论”的权力斗争,岩仓具视归国后上奏天皇,致使西乡出兵朝鲜的计划延期。西乡、板垣为表示抗议而辞去参议及政府官职。
- (10) 1873 年 1 月明治政府发布了全民皆兵的“征兵令”,但是,征兵令附加了免征兵役的宽松条项,如:官府奉职者、官公立学校的学生、支付 270 日元兵役免除缴纳金者等,免除条项为中等以上富裕家庭的适龄男子逃避兵役敞开了合法门路。服兵役不是官民共同的义务,而是政府立法迫使民众服役。广大民众对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各地发生了抵制和反对征兵政策的活动。
- (11) 西乡从道(1843—1902),出生于萨摩藩(鹿儿岛),西乡隆盛之弟。明治时期的军人、政治家。1874 年西乡从道率领兵士强行出兵台湾。
- (12) 华夷秩序,是晚清以前长期存在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内,视中国(中华)为中心,中华文化和思想具有最高的价值。
- (13) 万国公法(国际法)是指国家之间的法律,是处理各个国家及政府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规则和各项基本原则。万国公法秩序就是以万国公法为原则形成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说,是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

第3章

日本对外侵略——占有台湾的历史

被忘却了的出兵台湾

在第二章的最后，阐述了日本近代史上出兵台湾和最终占领台湾的过程。直率地说，在我刚开始学习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并不怎么关心和感兴趣。直到大学时代，我一直认为：日本最早的对外远征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

有关近代日本政治史的研究，最为关注的也是满洲事变以后昭和初期的政治军事史，并集中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太重视此前出兵台湾的历史。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化，我深切地感到：几乎在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同时，明治政府就已经开始策划对外出征，出兵台湾暴露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重新评价出兵台湾是极其必要的。

本章，根据我最初研究出兵台湾的论文资料，进一步就出兵台湾问题加以评述。明治7年，日本刚刚步入近代国家不久，明治政府为什么策划入侵台湾岛，并最终实施占领呢？对此，通过详细地考察日本近代史可以找出解答。

现在，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相持不下，两国国民及媒体都敏感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中日钓鱼岛争端，2012年中国国内再次掀起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我认为这是针对日本不反省战争责任（近代对于邻国的侵略）和歪曲历史进行的抗议。有关日本与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之间的岛屿争端问题，我并不打算从出兵台湾，以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历史中寻求岛屿争端的起因。但是，日本在步入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占领台湾攫取资源是近代日本国家利益的需要，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是整个近代日本不懈追求的战略目标。

不少事例表明，在近代发展过程中，日本为了获取资源通过武力扩张侵占他民族的领土，或者抢占无人居住的无主之地（用法律术语

就是“无物主”)。在追溯日本出兵台湾和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诸岛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历史经纬。

占有钓鱼岛的历史经纬

如今,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中日两国陷入紧张的对峙状态。从历史上来看,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5(明治28)年1月,日本单方面地宣布“无主地先占”⁽¹⁾,将钓鱼岛占为己有。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期间,1895年2月13日,日本决定攻占威海卫⁽²⁾,然后对澎湖诸岛实施占领。日本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向清帝国加紧攻势、胜局在握之时,秘密将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强行占为己有,编入了日本版图。

根据近代法律规定,在确认无物主的前提下,首先占有、统治的一方将拥有所有权。但是,根据中国的史料记载,钓鱼岛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明朝的《顺风相送》(1403年)中,册封使编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此外,琉球国最初的正史《中山世鉴》(1650年)中,明确地记载着钓鱼岛隶属于中国。基于这些历史资料,长期以来中国对钓鱼岛进行管理,特别是明朝初期,作为防御倭寇的一环,将钓鱼岛列为防御地区。有关钓鱼岛的历史经纬是清楚的,有诸多的历史资料可以查证,例如《海图编》(1561年)、《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05年)也都有明确记载。

如今,日本政府无视上述历史事实,只是反复地坚持“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种毫无凭据的主张能令人信服吗?所谓“无主地先占”的宣言,只不过是日本利用中日战争之时单方面做出的宣言,这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另外,依据《日清讲和条约》⁽³⁾,有将台湾本土和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的条款,但是,根本没有提及钓鱼岛领有权问题。

日本政府的主张是否妥当,存在着很多争议。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坚持“无物主的先占”宣言符合近代法律的规定,强词夺理为自身辩解。无疑,中国对日本的辩解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借战争之际占有中国的钓鱼岛,这是非法的窃取行为。也就是说,在签订日清讲和条约之前,日本利用近代法律单方面地宣布“无主地先占”,中国当然不能容忍日本借战争之际窃取领土的行为。

当时,也许中国对于“无主地先占”的近代法律知识还不甚了解。因为,自日本出兵台湾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止,清帝国在华夷秩序下建立了一个独自的“世界”,对于产生于西洋的近代法律并不关注。

以上,追溯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查证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甲午战争以后,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或法律后,是怎样判定钓鱼岛归属的呢?

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签署)⁽⁴⁾规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框架,但是,该条约只对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侵占的领土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没有提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占为己有的钓鱼岛问题。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通过战争(日俄战争以后)占有的土地等,不包括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按近代法律占有的钓鱼岛。

对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现在的日本政府不愿意追溯历史,或拿出近代法律做诠释。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战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新秩序,钓鱼岛主权问题,实际上触及到旧金山和约规定的战后东亚秩序等问题。对此,日本政府不愿意进一步触及或深究。因为旧金山和约规定的东亚秩序,确保了日本战后复兴和经济发展,使日美同盟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日本政府很清楚,如果对此深究或引发争议的话,弄不好将会适得其反,陷入做茧自缚的境地。

将台湾及澎湖诸岛纳入日本领土

有关台湾及澎湖诸岛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作为“胜者”,强迫清政府签署了不平等的《日清讲和条约》,将台湾及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由此,日本将台湾及澎湖诸岛纳入本国的领土。早在距中日甲午战争开战 20 年前,也就是 1874 年出兵台湾之时,日本就已经企图将台湾占为己有。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当时明治政府强行出兵台湾的意图和历史背景。

出兵台湾的起因,可以追溯到 1871(明治 4)年 9 月 13 日签署的《日清友好条约》⁽⁵⁾,这是规定日清关系对等化的条约。据此,明治政府试图将当时属于“华夷秩序”的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⁶⁾划入日本版图。我认为,出兵台湾是明治政府为了向国内外表明这一举措而采取的强硬手段。

1871 年,66 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 54 名被牡丹社乡居民杀害。日本借助这一事件,决定对台湾进行报复。西乡从道宣称,出兵台湾是作为“日本帝国政府的义务”,“讨蕃的公理⁽⁷⁾也是基于此原则”。总之,出兵台湾的目的是,向国内外公开表明琉球属于日本。

日本声言“讨蕃的公理”,企图将出兵台湾加以正当化,为之后占领台湾(1894 年)作充分的准备。日本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诸岛,占领台湾的夙愿终于得偿。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同时,还解决了当时日本外交上的最大悬案,修订不平等的条款,成功地签署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⁸⁾。

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宣传为“文明的战争”,即“文明国”日本与“野蛮国”清帝国的战争,成功地赢得了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福泽谕吉⁽⁹⁾和内村鉴三⁽¹⁰⁾等当时名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也把对中国开战视为行使“文明”国家的正当权利,积极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

日本企图占领台湾由来已久。为了成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必须拥有若干殖民地。正如外务大臣陆奥宗光⁽¹¹⁾在《蹇蹇录》中所主张的,与朝鲜并重的台湾是“必进入之地”,为对抗欧美诸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占领朝鲜及清帝国的台湾是当务之急的课题。

鉴于与俄罗斯的关系,明治政府不得不调整该时期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因此占领台湾就成了最优先考虑的课题。在日本看来,台湾没有被列入清帝国的华夷秩序,日本将其视为清帝国的“化外之地”⁽¹²⁾。牡丹社乡事件(1871年1月)发生后,围绕事件的处理,明治政府于1874(明治7)年2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

该要略第一条声称“台湾土著部落乃清政府所不及之地,不仅既往清帝国刊行史记的查证,去年前参议员副岛种臣赴清时,据清朝官吏的答复也可判明台湾蕃地为无主之地。对杀害我藩民琉球人民实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讨蕃公理也是基于此原则,以期讨蕃抚民。”(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10)第7卷,日本外交文书颁布会1955年版)。

也就是说,明治政府以台湾处于华夷秩序之外为由,对其强行发动了军事攻击。

当时明治政府内部对出兵台湾意见并不一致。1874年4月18日,木户孝允⁽¹³⁾为反对出兵台湾而辞职。山县有朋⁽¹⁴⁾和伊藤博文⁽¹⁵⁾也持消极态度。同时,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表示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禁止本国租用船只给日本。明治政府因此下令暂缓出兵台湾。

当时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台湾远征军司令官)的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出征部队在长崎港待命。他对明治政府暂缓出征的决定不服,并于5月2日派先锋部队出征。为了阻止西乡蛮干,大久保利通⁽¹⁶⁾前往长崎进行劝阻,但未能阻止。西乡的行动后来获得日本政府的追认,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承诺。最终,强行实施的出兵台湾,

投入了约 1000 万日元战争费用和 3600 名兵士。

当时清帝国承认“台湾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明治政府围绕善后处理，就选择“赔偿”和“占领”展开了争论。鉴于日本难以承受“占领”所需的财政负担，故采纳了“赔偿”（得到赔款从台湾撤军）。这表明日本外强中干，当时还并不具备拥有占领殖民地所需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此情况下，日本最终迫使清帝国承认日本出兵台湾属于“义举”，得到 50 万两白银（折合约 77 万日元）的赔偿后从台湾撤兵。10 月 31 日在北京签署了《日清两国互换条约》和《互换凭单》，据此，日本公开承认台湾生蕃住区属清帝国领土，同时，清帝国承认琉球属于日本领土。

作为出兵台湾的解决方式，双方签署的《日清两国互换条约》表明，日本政府基本上承认了中华帝国体制的华夷秩序及册封体制⁽¹⁷⁾，对清帝国的朝贡国——朝鲜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当时，朝鲜与清帝国和日本均有朝贡关系，日本和琉球有称为“交邻”的对等关系。虽然日本默认这种名分不清的外交关系，但又不安于现状，终于在出兵台湾 20 年后的 1894 年，日本再次筹划解体华夷秩序，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帝国宣战，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由此胜者日本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随后日本帝国的野心愈加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脱离华夷秩序到加入万国公法

自出兵台湾开始，明治政府内部已有这样的预测，即亚洲地区迟早会迎来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抗衡和竞争的时代。日本筹划解体以清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向亚洲地区扩张势力。

明治政府反对旧的华夷秩序，主张以万国公法取代华夷秩序。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按照万国公法所建立的是一个高度分权的横向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作为新兴国家的日本自然极力推崇这种横向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另一方面，万国公法不否定采取武力方式吞并其他国家或者兼并领土，具有较强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这显然也是为迎合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的。如上所述，在出兵台湾 20 年后，日本政府借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取得的“先占”规则，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际法进行领土扩张的事例。

日本以西欧国家为典范，试图早日步入欧美列强的行列。为此，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政策为口号，在万国公法的国际关系体系下努力增强国力，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亚洲强国。

以出兵台湾为契机，明治政府为促进华夷秩序的解体，开始在万国公法秩序下构筑新的国家战略。其最初的构想是，使朝鲜脱离与清帝国的朝贡关系，促进华夷秩序的解体。

另一方面，尽管清帝国将台湾视为“化外之地”，但实为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清就台湾问题进行交涉时，日本国内曾有议论：一旦谈判决裂，难免引发战争。也许清帝国汲取了日军侵入台湾的教训，在日军从台湾撤出之后，清帝国对台湾的重视程度也相应提升。

清帝国先是签署了《日清友好条约》(1871 年 9 月 13 日)，之后又承认了日朝间签署的《日朝友好条约》⁽¹⁸⁾(1876 年 2 月 26 日)，表现出按国际法开展外交关系的姿态。

但是，由于日本出兵台湾，彰显了本国领土可能被侵占的危机，清帝国表现出的反应比预想的更为强烈。台湾是清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使是“化外之地”，亦不可拱手让人，故以鲜明的态度坚守华夷秩序，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没有让步。20 年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也是为固守华夷秩序与日本展开的决战，现在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起因事实上也可以追溯到日军出兵台湾。

日本实行对外扩张的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甲

午战争就是推崇万国公法的日本明治政府和固守华夷秩序的清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也可以说这场战争是近代亚洲秩序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占领台湾的意图

历史时常会有其吊诡的一面。以出兵台湾为远因的甲午战争的结果,根据1895(明治27)年4月17日签署的甲午讲和条约,终于使日本获得了台湾及澎湖诸岛;另一方面,以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汉人有权势者和乡绅阶层为中心,发表了《建国宣言》(1895年5月23日)。台湾人民从此开始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

当时日本政坛元老之一松方正义⁽¹⁹⁾认为“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如欲向南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此一门户不可”,台湾是“北守南进政策的第一根据地”(德富猪一郎⁽²⁰⁾编:《公爵松方正义传》,公爵松方正义传记发行会1935年版),因此,占领台湾也就意味着可以确保日本向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以至南洋群岛进行扩张。

此后,实际上明治政府的决策者已经明确地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政策的一大据点。同时,英国、俄罗斯、法国等欧美列强,也都十分关注台湾及澎湖诸岛,想占为己有。鉴于此,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对台湾加紧了军事占领。

日本在出兵台湾、实施军事占领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终对台湾人民的抵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表明,在与帝国主义列强抗争中,日本也通过侵略战争终于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中。

当时,不断主张军备扩张的军人政治家山县有朋(当时任陆军大臣),1895(明治28)年4月15日在上奏《扩充军备意见书》中写

道：“有朝一日将改变与邻邦的优劣悬殊，要占领其一个岛屿，或者其部分区域。”主张应该不断扩充军备，目的是占领和统治岛屿以及开拓新的土地。同时，还明确提出了借助国际法扩大日本统治地域的方针。可见占领钓鱼岛也是这一时期实施扩大方针的举措之一。

从出兵台湾(1874年)到甲午战争(1894—1895年)，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和侵略模式。这种侵略模式不仅是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原型，也成为之后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也就是说，在既定的侵略目的地故意挑起事端，制造危机，随后以解除危机为借口行使武力。

日俄战争也是如此。为将朝鲜半岛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明治政府设定了俄罗斯夺取朝鲜半岛的危机，由此挑起了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更是同出一辙，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声言通过日俄战争掠取的“满蒙”(中国东北地域和内蒙古)权益受到了侵犯。

日本占领了台湾，标志着日本拥有了殖民地，开始向着帝国主义国家转变。日本在台湾依靠暴力手段对台湾民众进行残酷的压制，充分暴露了对台湾人民的歧视和排外意识。

由此，通过日本出兵台湾和占领台湾的过程，探讨和剖析衍生侵略思想的背景以及军国主义膨胀的原因是极其必要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后日本的历史研究中，从占领台湾的视角深入剖析日本帝国主义特征的研究还非常欠缺。这主要在于，大家都集中于中日战争的研究，而忽视了以台湾为主线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可以说，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台湾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研究的现状也许多少受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的影晌。

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翌年(1905年，明治38年)9月15日，日俄签署和约(《朴茨茅斯和约》⁽²¹⁾)，日本获得了南桦太和租借地、关东州以及满铁附属地。继而，按照1910(明治43)年8月22日签署的《日韩合并条约》⁽²²⁾，日本强行吞并了韩国。同年8月29日，

日本将韩国的国号再次改为“朝鲜”，在朝鲜设置了总督府。

1914(大正3)年8月23日,日本站在协约国一方与德国开战,并占领了原为德国占领的散布在密克罗尼西亚(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新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等。

日本帝国以战争为手段推进资本主义和实现近代化,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了与欧洲列强同样领有殖民地的梦想,大大扩张了日本帝国的经济版图。对日本来说,维持扩大经济版图和确保从统治地区获得利益,成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最大的国家目标。

为了将武力侵占的地区纳入日本的经济圈,发挥其经济效用,并将获得的利益顺利输送到日本,需要遵循一定的战略方针进行殖民地经营。

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之后,成为领有殖民地国家的日本,将殖民地以及统治地域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当时日本的领导层为整備国家体制以备日俄再战,提出了以增强国力为目标的“战后经营”。围绕如何实施“战后经营”,统治层内部有实施强权统治和协调政策的不同主张。最终为了加强对侵占地域的统治,确立了进一步扩大军备、对侵占地域实行强权统治的方针。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方针导致了日本国力不断耗竭。

“战后经营”开始成为日本帝国沉重的负担,加之欧美列强竞相在亚洲地区争夺殖民地,日本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成为殖民地保有国的日本,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这恐怕是始作俑者们没有料到的。

“战后经营”其实不只限于以殖民地为主的统治地域的“经营”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的课题。围绕“战后经营”,国内政治、军事、外交政策不断调整变化,领导层内部主张强权和协调的对立与妥协交替地进行。从这一意义上讲,解读日本进行“亚洲经营”的实质,可以更好地把握日本近代史的真相。

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帝国进行“战后经营”的地域，是以“本土”为基点向外扩张的同心圆。虽然台湾和朝鲜这两个直辖殖民地离中心最近，但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是以日本、满洲（中国东北部）及新占领的中国其他领土为“东亚新秩序”建设的主要目标，并且将其经济圈进一步构想为以“日满华”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更为广大的地域。

这是在与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业已形成的固有经济圈的对抗中摸索形成的。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均处于劣势的日本，为了与欧美列强进行抗衡，只能过分倚重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则需要一定的经济圈作为经济基础。

日本帝国以甲午战争后夺取了台湾和日俄战争后插手满洲为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进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悍然对东南亚实施军事占领，在该地区实质上也实施了殖民统治政策。

如此，日本通过武力扩张在亚洲地区推进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日本帝国的“本土”为基轴，从直辖殖民地（清帝国的台湾、朝鲜）到傀儡政府“满洲国”，再到半殖民地化的中国，军事占领地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广大地域，便形成了两圈、三圈乃至更多的环绕日本的同心圆。

日本从其势力范围的各个地区掠取的资源，因地而异，并不完全相同。台湾作为日本国内十分缺少的砂糖、樟脑⁽²³⁾等产品的粗加工基地受到重视。朝鲜作为将来日本向大陆国家飞跃的桥头堡，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评价清帝国的台湾和朝鲜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是多样的。

日本通过与英美开战，获得了东南亚以及太平洋诸岛，有关该地

区的价值,在1943(昭和18)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确定的《大东亚略政指导大纲》中,有如下记载:塞里伯斯岛(Celebes,后改名为苏拉维西[Sulawesi],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era,印度尼西亚)、爪哇岛(Java,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Borneo,印度尼西亚)等,“确定为帝国领土,努力作为重要资源的供给地加大开发力度,并掌握民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藏:《御前会议议事录》)。

可见,日本以多种目的通过武力侵占的亚洲各地区,成为其加强军备、扩大经济利益、攫取资源的对象。为了不断维持和扩大这种军事、经济利益,日本自占领台湾、朝鲜之后就形成了殖民地“经营”的战略构想。

对于用“战后经营”一词所概括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经营本质,有必要用概述近代日本整体发展的“帝国经营”用语进行归纳整理。

“帝国经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各个地区是有所不同的。既有像在台湾地区和朝鲜一样设置总督府以军政形式实施统治的地方,也有像“满洲国”一样,表面上是该国的皇帝和政府发号施令,但实质上是日本的傀儡,完全由日本军政官员把握实权的统治地域。另外,还有像缅甸和菲律宾等地,日本承认其“独立”,但事实上却通过保护国的形式进行统治。日本就是这样渐次步入了“帝国经营”的轨道。从这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当年出兵台湾是日本步入“帝国经营”轨道的出发点。

甲午战争的评价

不言而喻,继出兵台湾之后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对之后日本侵略思想的展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甲午战争是日本与中国围绕争夺朝鲜半岛展开的一场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对朝鲜半岛事实上的统治权，加速了向大陆侵略扩张的进程。朝鲜半岛被确立为日本进攻大陆的桥头堡。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清帝国，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这给日本带来一大转机。日本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受压制的国家，转变成与西方列强同一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

从幕府末期开始的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思想，到甲午战争时不再是议事桌前的空论。日本通过武力将昔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不仅是进攻大陆论的鼓吹者，在一般国民中，“亚洲强国日本”的意识也大大增强，这是不难想象的。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社会及国民的“强国”意识显著增强。明治 20 年代至 30 年代接连创刊的杂志等媒体协助宣传，使这种国民意识愈加膨胀。这一时期，国民对教养、娱乐等需求增大，杂志媒体对国民的思想观念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甲午战争期间，1895 年 1 月《太阳》杂志创刊，命名为“太阳”的寓意是“现在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注目，是充满荣光的国家，其存在正如同‘太阳’一般”。

在同年 11 月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上，町田忠治⁽²⁴⁾就创刊的意义写道：“日本成为东洋唯一的立宪强国”，为了发展成更加强大的国家，“将西欧列强欲争夺的东洋贸易控制于我手，将来不定何时，将可完全把握东洋的商权”。该杂志为确立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霸权积极提供信息，显示出极大的热忱。

以这种言论为基调的杂志还可列举很多，如《世界之日本》(1896 年创刊)、《中央公论》(1899 年创刊)等。这类杂志力图使日本国民拥有一种“大国意识”或“一等国意识”，媒体的宣传也确实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这种“大国意识”和“一等国意识”必然会助长军事强国情绪及信念。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国民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民族自

信心大大增强,内向型民族主义明显地向外向型民族主义转换。

内向型民族主义是指以国家为本,以保守或坚持民族传统文化为最大的价值目标。而外向型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和民族比较,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不言而喻,外向型民族主义包含对亚洲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或蔑视。

另一方面,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开始,日本真正地步入帝国主义初期阶段,当时还只能靠向英国等列强贷款来维持日俄战争的费用,属于尚未成熟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依靠欧美列强,显然还缺乏实力,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不堪忍受的,也成为急于向中国大陆侵略扩张的要因。对欧美列强自卑,对亚洲国家自大,日本人的这两种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主义的形成

在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开始真正形成的过程中,值得瞩目的是号称明治论客的思想家高山樗牛⁽²⁵⁾在他主持的《太阳》杂志中提倡的“日本主义”。对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进一步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日本主义反映了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表现出的双重心态。

高山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国粹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过于强调反欧化理念的国粹主义者未免眼界狭窄,不能超出一国主义的范畴,缺乏放眼世界的宽阔视野。高山主张的日本主义,强调日本在广袤世界中一国的地位,立足放眼世界、超越国粹主义狭隘的思想体系。以高山为代表的日本主义者主张“君民一体,忠君爱国”,强调个人对天皇及天皇国家的绝对服从,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乃至在战争期间,应从思想上、精神上强制地动员国民效忠报国。

“日本主义”不像国粹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只是在日本文化传统和遗产方面求得民族一体感。“日本主义”主张为对抗西方列强的

侵略，最重要的是树立一个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强国目标，求得民族一体感。

正是向自立的帝国主义强国的转换，成为“日本主义”最大的命题。此中最为迫切的课题就是，要建设一个足以与欧美帝国主义强国并驾齐驱的亚洲强国。

高山樗牛提倡的“日本主义”以及前面提到的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这两种观点均主张日本应该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地。这些侵略扩张的言论，掀起了狂热鼓吹侵略亚洲近邻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潮，成为之后渐渐形成的日本人的大国意识或“帝国意识”的雏形。

与高山樗牛对国粹主义的批判一样，德富的扩张主义也对国粹主义的保守性进行了驳斥。德富主张日本必须向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总之，要走对外侵略扩张之路。将日本占有钓鱼岛的时期与德富的日本膨胀论结合起来看的话，1895年明治政府宣布“无主地先占”将钓鱼岛占为已有，刚好是《大日本膨胀论》出版的第二年。顺便说一下，《大日本膨胀论》一书出版后，赢得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与赞赏。

以甲午战争的胜利为契机，德富的侵略扩张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德富看来，甲午战争是日本寻求向外发展的胜利成果，为日本提供了向大陆扩张的大好机遇。

该时期，除了德富苏峰之外，还有历史学家山路爱山⁽²⁶⁾，他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认为作为“大国民”的日本民族能够参与帝国主义的争夺战，“是适者生存，是天赐的荣耀”。

另外，思想家浮田和民⁽²⁷⁾积极主张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瓜分世界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将其称为“伦理的帝国主义”。这些学说被广为宣传，五花八门的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在舆论界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德富苏峰和福泽谕吉等代表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将甲午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他们强调，这是为对抗欧

美列强进行的防御战,是为了对朝鲜和中国进行变革的需要。同时,将西方列强的动向视为威胁日本的危机,将甲午战争积极地评价为日本扩张的一大契机,这些言论充斥传媒,对国民的思维走向有很大的影响。

统治大陆的渴望

日俄战争后,“战后经营”成为日本政府最大的政治目标,明治20—30年代的侵略大陆思想在这一国家目标中被继承延续下来。1906(明治39)年1月25日,曾担任过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公望⁽²⁸⁾首相在第22届帝国议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指出:“为了帝国的发展,要努力搞好满洲经营与韩国统监,国力的发展刻不容缓”(天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二卷,宝文馆1924年版),强调向满洲和朝鲜半岛的扩张和经营应占据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这表明日本决心以军事为后盾,与西方列强展开角逐,在中国和朝鲜争夺霸权。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战后经营”论的展开进一步加速了日本侵略大陆思想的形成。

到了明治中期,侵略思想真正地进入付诸实践的阶段,其直接执行者是日本陆军。在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投入战争经费17亿日元,日军累计兵力约109万人,日军伤亡约12万人。

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最终日本获得了占领桦太南半部,获得俄罗斯租借地(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权益,并且获得了对朝鲜半岛的单独控制权。日本一举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侵略大陆思想成为明治政府“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1906(明治39)年2月9日,由陆军总参谋长大山巖⁽²⁹⁾上奏《明治39年日本

帝国陆军作战计划策定纲要》，经明治天皇采纳成为正式文书。

该文书中明确记有“明治 39 年以后帝国陆军的作战计划采取攻势原则”的条文（陆军省编：《明治天皇御传记资料·明治军事史》下卷，原书房 1979 年版），改变以往的守势作战，将攻势作战作为基本的战略方针。

此后，日本陆军的作战计划一贯采用攻势作战。为了实现称霸亚洲的梦想，日本加速了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步伐。

下面通过在陆军中大力推行侵略大陆思想的军事官僚田中义一⁽³⁰⁾的观点，介绍一下该时期日本陆军当局侵略大陆思想的内容。

田中义一在 1906（明治 39）年撰写的《随感杂录》中，就《明治 39 年日本帝国陆军作战策定纲要》的预想内容，提出了战后经营的大方针，他认为：“战后经营意义重大，战后经营大方针并非单纯决定陆海军兵力，而且应该与帝国大政相关。帝国在海外拥有保护国与租借地，且已缔结日英攻守同盟，不能再以昔日的守势作战为主，必须以攻势作战为重点，并以此作为战后军事经营的基础。”（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藏：《田中义一关系文书》卷八）

田中的国防主张驳斥了同时期山本权兵卫⁽³¹⁾所代表的海军主流派主张的“岛屿之国”论，赤裸裸地表明要构筑“大陆国家”日本的国政方针。田中的这一观点完全承袭了德富苏峰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

田中在《随感杂录》中的主张成为《帝国国防方针》的基础材料，1907（明治 40）年 4 月，《帝国国防方针》正式出台。在此，具体介绍一下促成《帝国国防方针》出台的过程以及田中所描述的侵华计划及其对中国的认识。

1906（明治 39）年 8 月 31 日，山县有朋接到了田中义一起草的《帝国国防方针案》（通常称为《田中奏折》），其中写道，“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清帝国有利”，将中国确定为扩张“国利国权”的对象地域，并狂言道，侵略中国是“赋予日本帝国的权利”。

田中对中国的认识中,还有难以消除的对中国的歧视。正如其所言:“清帝国没有自我保持国内秩序之能力”,极力贬低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缺乏进行自我管理的统治能力。他在《随想杂录》中还写道:“清帝国将来取得大的发展,达成可能挫败各国欲望的盛运,其发展还甚为遥远,几乎近于空想。”

主持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山县有朋,实际上并没有像田中那样直接散布蔑视中国的言论。例如,在《战后经营意见书》(1905年8月)中,山县有朋主张,准备与俄罗斯再战,“第一,密切与清帝国政府的关系,通过该国的进步发达以图东亚安定”(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在与中国保持对等的立场上,通过加强外交关系和联合,共同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便是山县所推行的中日一体论。

山县在《对清意见书》(1907年1月)中,对日俄战争中清帝国保持中立态度给予一定的评价。虽然对中国国内象征收回利权运动的反日态势抱有警戒之念,但不主张以战争和武力去解决,而是“对清帝国主要靠外交途径,避免引发无谓的误解”(同上),主张对中国的外交应取平和稳妥之方针。

这的确是明智合理的判断。然而由山县制定的正式文书《帝国国防方针》(通常称作“山县奏折”或者“山县元帅奏案”)中,也有“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清帝国有利”的表述,几乎照本宣科地沿用了“田中奏折”。可以说其中有关对中国的作战概要,以及对中国的认识都没有脱离《田中奏折》的框架。

大陆国家构想的实现

《帝国国防方针》第一项“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中,明确记载了“国权的扩张”首先以满洲和韩国为对象,其次从东南亚向太平洋扩

展。该国防方针主张,从这些地域获得利权致力于“增进国利民福”。这表明将日俄战争所获得的满洲及韩国的利权进一步扩大,今后的使命是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的势力。

该内容与田中义一在《随感杂录》中展开的“大陆国家”构想相差无几。田中的建设“大陆国家日本”的设想,不仅成为帝国国防方针的核心内容,同时作为国家政策决定了以后明治政府的发展道路。

田中主张的建设“大陆国家日本”,换言之就是“攻势国防论”和“大陆帝国论”,实质上否定了该时期以日本海军为中心倡导的另一种国家构想——“守势国防论”和“岛屿之国论”。以田中为首,特别是日本陆军反复强调日本的发展出路在于向大陆扩张。

根据田中的主张概括形成的“大陆国家日本”这一战略,可以说是积极地采纳了从明治初期到中期舆论界大肆鼓吹的进攻大陆论和扩张主义的结果。

《帝国国防方针》出台后,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如: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³²⁾(1912年)、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15—1916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郭松龄事件(1925年)、第一次出兵山东⁽³³⁾(1927年)、炸死张作霖事件⁽³⁴⁾(1928年)、第二次出兵山东(1928年),以及成为中日15年战争触发点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等。日本的侵华政策正是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政治行动付诸实施的。

日本政府和军部极力推崇的理论思想有:德富苏峰倡导的“中日联合论”,陆军省新闻班编制的《提倡强化国防的本旨》(通称《陆军手册》,1934年10月颁布)中提倡的“日满一体化论”和“日满支一体化论”,以及石原莞尔⁽³⁵⁾倡导的“东亚联盟论”,这些主张都被纳入了《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之中。

这些论述的共同之处就是将侵略事实加以正当化。例如,基于石原莞尔的主张,宫崎正义⁽³⁶⁾在编著的《东亚联盟论》(改造社1938年出版)中写道:“满洲国”于1932年建国,对于东洋解放以及新建设

“具有道义和文化方面的意义”。

继而，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1937年7月)后盛行的“东亚协同比论”以及三木清⁽³⁷⁾等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论”，主张推进与亚洲国家的联合，表示从正面接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追求新的联合方式。但是，这些东亚共同体论都遭遇挫折，被淹没在侵略大陆舆论的浪潮中。1938(昭和13)年11月3日，近卫文麿⁽³⁸⁾内阁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³⁹⁾)，这一声明是以“东亚协同比论”为基础制定的，实际上掩盖了日本霸权主义的真实意图。

1940年开始登场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把帝国主义扩张正当化的政治口号，是对侵略战争的一种诡辩。历史业已证明，大东亚共荣圈纯粹是个幌子，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以“共荣”之名行侵略之实。日本政客和侵略战争的鼓吹者为了压制被侵略国家的反日斗争炮制了这一虚构的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中所蕴含的对朝鲜、中国的不公正、不切实际的认识，今后也有必要进一步检讨和反思。

注释：

- (1) 按国际法规定，先占指一个国家可以占取当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无主地)，取得对无主地的所有权。
- (2) 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日本军击败了守卫在威海海军基地的清帝国北洋舰队。
- (3) 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该条约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签署，又称《下关条约》，中国称之为《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
 - 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
- (4) 正式名称为《对日讲和条约》(中国称《旧金山和约》)。有52个国家参加。除中国、朝鲜未被邀请赴会之外，印度、缅甸等拒绝出席会议，而且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三国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冲绳、小笠原群岛等被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同日，日美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成军事

同盟关系。

- (5) 1871年7月29日签署。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欧美列强的威胁,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机遇和危机,《修好条规》是1871年中日之间缔结的建交条约,是一项平等条约。
- (6) 日本政府在出兵台湾之前,于1872年将琉球王国改为琉球藩。
- (7) 蕃是对台湾原住民的蔑称。
- (8) 1894年7月16日签署。条约的签订意味着1854年以后西方列强对日本之不平等条约与治外法权的结束。日本收回了法权和部分税收,把片面的最惠国条约改为相互对等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签署该条约后,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脱离清政府的控制,随后甲午战争爆发。
- (9) 福泽谕吉(1835—1901),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庆应义塾创始人,生于大阪中津藩(大分县)藏屋敷。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1885年他发表了《脱亚论》后,提倡对外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
- (10) 内村鉴三(1861—1930),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家。甲午战争时倡导《义战论》,日俄战争时主张《非战论》,力主和平解决日俄争端。
- (11) 陆奥宗光(1844—1897),明治时期的外交官。1894年负责与英国签署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此前的不平等条约与治外法权,是甲午战争的直接推动者。
- (12) 指“中华文明以外,未开化的地方”。
- (13) 木户孝允(1833—1877),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本名桂小五郎,出生于长州藩(山口县)萩市。1866年,在坂本龙马的撮合下,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会晤,缔结了《萨长同盟》密约,集结势力推翻幕府。明治政府成立后,为政府主要成员。他起初提倡征韩论,以便转移下级武士的不满,后改变了态度,1872年反对西乡等的征韩论。
- (14) 山县有朋(1838—1922),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人(元帅)、政治家,出生于长州藩(山口县)。甲午战争时担任第一军司令官,日俄战争时任总参谋长。
- (15) 伊藤博文(1841—1909),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出生于长州藩。1881年策划政变,迫使大隈重信辞职,他成为政界头号人物。主持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皇室典范》,并设立了枢密院等,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体制。1885年成为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1905年,日本胁迫韩国与其缔结《日韩保护协约》,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韩国统监。1909年在哈尔滨车站月台上被朝鲜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击毙。
- (16) 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著名政治家,出身于萨摩藩(鹿儿岛县)。1866年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缔结《萨长同盟》,成为倒幕

派的领袖。1873年任岩仓使节团副使，归国后反对征韩论。1874年转而主张征伐台湾，提出“台湾蕃地处分要略”。

- (17) 中国皇朝的皇帝通过册封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结成(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接受册封的君主，被授以王或侯等爵号，成为中国皇帝的臣下。
- (18) 1875年9月，日本云扬号军舰入侵朝鲜西海岸，进行炮击骚扰，朝鲜江华岛炮台守军进行还击，最后日军攻陷了炮台。日本利用这一事件打开朝鲜的国门，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缔结《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该条规第一条特别声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其真正目的是想借“自主”与“平等”之名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主要内容为：朝鲜政府开放第五款所载两口岸，准日本人民往来通商，随意在该两地租借地皮，修盖房屋，并租朝鲜人民之房屋(第四款)；在京畿、忠清、全罗、庆尚、咸镜五道，沿海择定便利通商之港口两处，开埠日期自日本历明治9年2月，朝鲜历丙子年正月起算，经过十二个月(第五款)。这是日本靠武力迫使朝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 (19) 松方正义(1835—1924)，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出生于萨摩藩。1895年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大藏大臣，甲午战争后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 (20) 德富苏峰(1863—1957)，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评论家，出生于肥后藩(熊本县)。1887年创办《国民之友》，甲午战争后他成为军国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主张推行以皇室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宪政，即君主立宪制。1942年出任日本新闻界支持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本名德富猪一郎，是德富芦花的哥哥。
- (21) 日俄讲和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经济及军事特权；②俄国将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③俄国将其所获得的中国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④俄国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并同意日本渔民在俄国沿岸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进行渔业活动。
- (22) 1904年2月23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议定书》，规定韩国协助日本对俄作战；同年8月22日，日本又迫使韩国签订《第一次日韩协约》，将日本人以财政顾问和外交顾问的身份安插到韩国政府；1905年11月17日胁迫韩国与其缔结《第二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与韩国订立了《第三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司法权，解散了韩国的军队。3年之内日本迫使韩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韩国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第一条：韩国皇帝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的签订，标志着韩国彻底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 (23) 从樟树的根、枝叶提取的医药原料。
- (24) 町田忠治(1863—1946),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实业家。创办了《东洋经济新刊》。任近卫内阁的参议、翼赞会顾问、战前小矶内阁国务大臣。战后1946年被革除公职。
- (25) 高山樗牛(1871—1902),明治时期的评论家。1897年开始任《太阳》杂志的主编。他信仰尼采的个人主义,后来又吹捧日本主义。其文学作品带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赢得明治后期青年的喜爱。
- (26) 山路爱山(1864—1917),明治时期的史论家、评论家。1903年个人杂志《独立评论》创刊。在该杂志上发表言论,是积极鼓吹日俄战争的主战论者。
- (27) 浮田和民(1859—1945),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学家,活跃于日本论坛的政论家。1909年起担任日本舆论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太阳》的主编,被誉为大正民主主义的理论先驱。他提出伦理的帝国主义,主张对朝鲜实行同化政策。
- (28) 西园寺公望(1849—1940),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公爵。被誉为日本帝国最后的元老。
- (29) 大山严(1842—1916),明治时期的军人、元帅,出生于萨摩藩(鹿儿岛县),是与山县有朋并列的陆军统帅级人物。日俄战争时担任满洲司令官。
- (30) 田中义一(1864—1929),明治、大正时期的陆军将领(大将)、政治家,出生于长州藩(山口县)。参加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任满洲军参谋。出兵西伯利亚时任指挥。田中义一内阁对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组织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在加紧推行侵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上,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田中内阁为维护在华利益,三次向山东派兵。
- (31) 山本权兵卫(1852—1933),明治、大正时期的海军将领(大将)。出生于萨摩藩(鹿儿岛县)。参加了甲午战争,主张避免与俄国开战。后任日本总理大臣。1914年因海军受贿事件(接受德国西门子公司公司的贿赂,又称西门子事件)被迫辞职。
- (32) 1912年,日本军部和大陆浪人趁辛亥革命爆发、政局动荡之机,企图将满蒙(东北地区及内蒙东部)从中国分割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日本军部及日本大陆浪人策划了扶持原清朝大臣肃亲王、拟在满洲建立独立政权的运动。
- (33) 国民党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出兵攻打中国东北的军阀头目张作霖。为了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田中内阁自1927年开始,两年之内三次向山东派兵,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
- (34) 在日本的支持协助下,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大,1926年12月他率奉军进入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大元帅。之后,张作霖表现出反共、反日的姿

态,这对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造成威胁。为此,日本军部开始策划除掉张作霖,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沈阳皇姑屯。

- (35) 石原莞尔(1889—1949),昭和时期的陆军中将。曾任关东军参谋,直接参与了一系列侵华事件的谋划与实施。1931年与板垣征四郎等人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趁机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
- (36) 宫崎正义(1893—1954)。在石原莞尔的倡导下,宫崎正义创设了研究统制经济和战时体制的智囊机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
- (37) 三木清(1897—1945),大正、昭和时期的哲学家。因被指控犯有违反“治安维持法”罪被捕入狱,1945年9月26日死于狱中。他从人本主义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专心研究西田哲学。
- (38) 近卫文麿(1891—1945),昭和时期的贵族政治家。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0年近卫第二次组阁,极力推行法西斯“新体制运动”,对外推行南进政策,建立了“大政翼赞会”。随着战局恶化,近卫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才能保存天皇制,因而向天皇上奏“最堪忧虑的,与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由于战败可能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1945年12月,收到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出的战犯嫌疑罪逮捕令,被传讯前服毒自杀。
- (39)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第4章

日本的对韩认识

日韩竹岛之争

有关竹岛的主权问题，内藤正中氏（岛根大学名誉教授）已经查考了确凿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充分的考证。现在，日本和韩国围绕竹岛的领土主权问题僵持不下。内藤氏的查证表明，1695年12月25日，德川幕府向鸟取藩确认郁陵岛和竹岛的所属时，得知这些岛不属于鸟取藩所有。据此，1696年幕府发布了“禁止渡海令”，禁止日本渔民渡海到郁陵岛进行捕鱼活动。继而，到了明治时代，1876（明治9）年10月16日，岛根县向内务省询问“日本海内竹岛外一岛属否之事”。内务省向当时国家最高机关的太政官请示，太政官回复道：“竹岛一岛与本国无关。”内务省公布了表明竹岛不属于日本领土的“太政官指令”（内藤正中《竹岛 = 独岛问题入门——批判日本外务省的“竹岛”论》，新干社，2008年）。

内藤氏的历史考证表明，日韩领土争端的竹岛不属于日本的领土。不过，也并不能就此断定竹岛是当时李氏朝鲜的领土。也就是说，很有可能竹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小岛是没有领主的无主土地，用法律用语表述的话，就是“无主物”。

日俄战争期间，鉴于竹岛及周边海域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明治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1905年1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宣告对竹岛拥有主权。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半岛正式并入日本帝国领土，竹岛事实上成为日本的领土。战后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处于混乱状态，随后朝鲜战争⁽¹⁾爆发，竹岛周边海域的渔业活动一时中止，即使有人登岛，竹岛的存在也不再为人注目。

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为了宣示海洋主权范围，1952年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日韩两国之间的日本海公海海域划定水域界限（通称

“李承晚线”⁽²⁾),将竹岛划入了韩国界域之内。自此开始引发日韩之间围绕竹岛主权问题的争端,并一直延续到今日。日本政府不承认“李承晚线”,强调近代以来竹岛一直是日本渔民进行渔业活动的场所,坚持竹岛是日本的领土。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竹岛周围海域丰富的海底资源开始受到关注,直至今日,韩国政府一直对该岛进行实效统治。2012年8月1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与日本存在主权争议的竹岛访问,以宣示韩国对该岛的主权和控制权。

围绕竹岛主权之争,日韩双方相持不下,前景不容乐观。在我看来,日韩两国关系陷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主要原因与近代以来日本人对韩国的认识有关。现在大多日本人对韩国的认识观念是从日本近代开始培育形成的,特别是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难以消除过去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时形成的认识和观念。

2003年4月—9月,日本放送协会第2频道播放了韩国电视连续剧《冬季恋歌》,随后,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韩流热潮”。现在日本的电视频道几乎每天都播放韩剧,少女时代和KARA女子组合在日本大获成功,东方神起、花美男乐队 FT Island、韩国的男子组合(K-pop)席卷日本。此外,韩国先进的IT技术在日本受到好评,韩国的现代汽车、三星电子等一流企业已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可与垄断市场的日本家电及汽车企业并驾齐驱,甚至超过日本的企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日本游客赴韩国观光也成为一大热潮,便宜的旅费享受轻松愉快的旅行。对日本人来说,近年来对韩国的亲近感与日俱增。然而,因竹岛争端引发日韩关系急剧恶化,媒体报道也随之转向,如同给狂热一时的韩流泼了冷水。如今亲韩论降温,韩流开始退潮。尽管亲韩论和韩流热潮不会轻易地消失,但是韩流在日本退潮之势已日见明显。同时,日本国内的厌韩论、反韩情绪不断升温。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恶意攻击诽谤的言论,更是长期以来不绝于耳。

近代以来日本人对韩国、北朝鲜的认识⁽³⁾，已经根植于日本人的意识深层中，这么说并不过分。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韩国、北朝鲜的呢？以下通过回顾日本的近代史，来解答这一问题。

日本占有朝鲜的野心是从何时萌发的？

日本是从何时开始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朝鲜抱有侵占野心的呢？要确定具体的时期比较困难。在此，主要对日本的近现代史，尤其是日本开始关注中国、朝鲜的江户时代后期至幕府末期进行回顾和考察。然而，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曾两次出征朝鲜⁽⁴⁾，日本的军队越过日本海侵入朝鲜。另外，1874（明治7）年日本出兵台湾。这些早期的对外侵略行为，在日本近代史上并没有记载。

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亚洲论，对这些言论并不能一概而论，全部归结为昭和初期向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的侵略思想。大陆侵略思想就是：日本将亚洲大陆视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市场和资源基地，是日本实施政治军事霸权统治的对象地域。而各种亚洲论的主张，势必要确立日本国家及民族的位置及其与亚洲的关系。这些亚洲论，最初基本上都是针对亚洲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来立论，并进一步展开的。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为重大课题，在各种亚洲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向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的侵略思想。

国家权力向外膨胀（= 膨胀主义）、通过武力扩大版图（= 侵略主义）、以民族优越感自恃（= 民族主义），这些是日本推进近代化的主要特征，而各种论说为推进近代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国民的“帝国意识”不断地滋长和强化。

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以侵略思想为理论基础，不断深化“帝国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日本虽然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帝国扩张

之梦破灭了,但是,很难说根植于日本国民中的“帝国意识”就随之消除、不复存在了。相反,从日本国内来看,如今“帝国意识”又在复苏,并日趋膨胀。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为入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试图通过国内舆论来影响国际舆论,希望在国际上表现出强国架势;在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上表现出逃避战争责任、抹煞历史事实的行为等。下面,通过探讨日本侵略思想和帝国意识的源流,考察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

吉田松阴⁽⁵⁾的占有朝鲜论

进入幕府末期,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面临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在此情况下,以中下级武士为骨干的倒幕派发动推翻幕府统治的倒幕运动。攘夷论和尊王论结合起来,以尊王攘夷作为反幕的口号,最终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尊王攘夷论被视为排外民族主义的前期形态,实质上掩藏着王政复古、维持封建制度的要素。在幕府末期尊王攘夷论登场之前,许多日本经世学家从抵抗西欧列强侵略的必要性出发积极著书立说,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这些理论主张日本跳出岛国的局限,奠定了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的思想基础。德川幕府末期,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中,代表人物有林子平⁽⁶⁾和本多利明⁽⁷⁾。林子平著有《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和《海国兵谈》(1791年)等;本田利明著有《西域物语》(1798年)和《经世秘策》(1791年)等,然而,两个人的主张显然不同。为了应对推进南下政策的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来自庞大的邻国中国的潜在威胁,林子平提出海防论,加强岛国日本的海防。而本多利明主张的是一种贸易立国论,他提出日本的扩展对象不仅是中国、朝鲜,而是包括整个亚洲地区。

林子平从军事和国防观点出发,主张以攻为守,向海外扩张,他

提出：“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北海道的旧称）、朝鲜、琉球。”也就是说，林子明最早强调为对抗俄国的威胁而领有朝鲜的必要性。与林子明的军事至上主义相比，本多主张走经济自立之路，通过非军事手段促进日本的发展。他强调，作为经济自立的前提，应充分利用海洋，将日本发展的基地扩大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亚洲地区。这也是明治初期开始登场的“南进论”的思想萌芽。林子平提出的为防备俄国南下而领有朝鲜的军事扩张论，成为从明治初期至中期急剧展开的大陆侵略思想的起源。本多利明的主张，则成为后来以海军军事官僚为中心倡导的“南进论”的出发点。

林子平尖锐地指出闭关锁国的弊端，他主张制定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普及新型国防思想乃当务之急。因此，林子平的主张一般被视为开明思想。与此相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1855（安政2）年4月2日，吉田松阴在给杉梅太郎⁽⁸⁾的信中写道：“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易攻取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39年）。这成为之后的“征韩论”的先声。

1854（安政元）年3月31日，江户幕府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⁹⁾，日本被迫“开国”后，不断推出一些向海外进取的构想。从之后的历史来看，意味着对外扩张的开始。当时日本向海外进取的内容包括：开展对外贸易发展经济，通过武力扩大版图等，并且这一时期，主张日本向外发展的扩张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日本自签订《日美和亲条约》被迫“开国”后，在与西方列强进行抗争的同时，有识之士提出学习西洋的强国之术，向亚洲大陆进行扩张，吉田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幕府末期的代表人物还有桥本左内⁽¹⁰⁾，桥本主张：日本应与俄国结盟，与美国保持协

调,向亚洲大陆扩张。

开始关注朝鲜

1857(安政4)年11月28日,桥本在给村田氏寿⁽¹¹⁾的信中写道:“视美国为一东藩、思西洋为我所属,以俄国为兄弟唇齿,掠夺邻国乃当务之急”(景岳会编《桥本景岳全集》上卷,景岳会,1939年)。可见,桥本的主张就是,一方面屈从西方列强,另一方面对“邻国”(=亚洲)实行扩张。应该说这就是后起的日本帝国的原型,它预示着日本步入了屈从西欧列强、压制亚洲国家这种“双重帝国主义”之路。

吉田和桥本主张的大陆侵略构想,通过1873(明治6)年的征韩论表现出来。同年8月3日,当时任明治政府参议的西乡隆盛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请求内阁决定向朝鲜派兵的意见书。8月17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西乡的意见书。力主内治优先、反对征韩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¹²⁾提议待赴欧美视察的岩仓具视归国后再作决定。10月14日,归国后的岩仓具视出席的内阁会议上再次决定派西乡出征事宜,持反对意见的木户、大久保、大隈不服,向内閣提出了辞职。

明治政府陷入混乱,岩仓请明治天皇裁决征韩之议,天皇采纳了岩仓的内治优先论。征韩之议被无限期推迟,西乡对此不满愤而辞去了政府官职。这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征韩论展开的一场权力斗争。这期间,日本国内舆论支持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西乡提出的征韩论,同时,通过征韩论暴露出了政府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也引发了舆论对朝鲜关注的热度急剧上升。

那么,征韩论究竟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呢?当时,日本实施了以全民皆兵为主要内容的征兵制,武士家族担心在军事部门的独霸地位有崩溃之虞,对政府强烈不满,纷起叛乱。为了缓解士族不

平之气，政客或欲通过出征朝鲜为士族开辟炫耀武力的舞台。但是，不管征韩论的动机何在，其最大目标是力图通过领有朝鲜半岛来调整和缓解国内权力斗争和矛盾，解除国内危机。“征韩论”是稍后形成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基础和核心，是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

也就是说，日本以受到外部威胁为由设定危机，再通过武力手段消除危机，进而转移和缓解国内矛盾。设定危机的一方，即日本政府或日本人总是以自我为本位，单方面地制造借口或危机来发动侵略战争，日本自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形成之初开始，就一直重复不断地沿用这种手法。

吉田松阴主张的“易攻取之朝鲜”，把朝鲜视为最初的侵略对象。侵朝计划由于西乡下野曾一时受挫，然而，明治政府及国民的观念中已形成定式，那就是侵占朝鲜是迟早的事情。

大陆侵略思想的基本构造反映了国内权利构造的特性，并且又影响着国内权利构造的变化，实际上扩张思想通过众多的推行者以及多样的形态展开。同时对外扩张思想具有自发性和外部性，日本的大陆侵略思想以自发性为主，所以总是以国内政治社会状况和权力构造的变化，来制造危机和策划攻击的对象。即使客观上并不存在危机，也很善于寻衅滋事，巧妙地制造事端并确定攻击的对象，这成为缓解日本国内各种矛盾和强化权力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日本的扩张思想从来就缺少客观理由，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侵略扩张政策，需要一种特殊的思想装置来全力驱动。并且，运用各种花言巧语来掩饰，为缺少客观合理性的侵略战争进行辩解。之后，日本充分运用天皇制，以效忠天皇进行“圣战”的名义连续发动侵略战争。

从这一视点来看，征韩论的出发点是通过攻打和占有朝鲜来缓解国内矛盾，恢复国内的士族权力，并不是基于西欧列强侵略亚洲的危机认识所做出的选择。征韩论终归不是为抵抗西欧列强而加强对朝鲜半岛的防卫，或是建立日韩同盟。正如 1873 年 8 月 17 日西乡隆

盛在给板垣退助⁽¹³⁾的信里写道：“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大西乡全集》第二卷，平凡社，1927年）。可见，西乡主张征韩，是为转移国内武士阶层的不满情绪，不过是权力争夺的一个手段。

杉田鹑山⁽¹⁴⁾主张的亚洲人民团结论

民权思想家利用从西方传入的民权思想，倡导从民的角度向明治政府提出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建立由下及上的近代民主国家的政治要求。这与明治政府推行的由上及下的近代国家路线产生极大的分歧。因此，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与明治政府基本上形成对抗的态势，他们同样也遭到亚洲专制和封建势力的排斥。民权论者号召亚洲人民联合起来，摆脱强权统治的压制。

例如，民权论者杉田鹑山在《东洋恢复论》（1880年）和《兴亚策》（1883年）中曾主张，为了将亚洲人民从专制权力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在亚洲广大地域扩大自由民权运动是极其必要的。根据杉田鹑山早期的观点，以朝鲜、中国为主的亚洲，主要应是日本支援和联合的对象，而决非是侵略的对象。其他民权论者尽管不像杉田那样态度鲜明，但也抱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打倒明治政府的专制权力，解放处于专制压迫下的广大民众。可以说民权论正是将人民的解放视为自身的政治目标。

可是，杉田所代表的对中国（当时的清朝）的认识随后渐渐发生了变化。他根据访问中国的经历和体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他认为中国民众缺少自主性，即使有来自日本的支援和联合，也没有能力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同时，他还断言道：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

杉田在《东洋攻略》（1886年）中作过如下论述，即日本迟早也会成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象，与其拿出精力支援中国，“不如加紧取之，

成为列强同伙”(杂贺博爱《杉田鹑山翁》，鹑山会，1928年)，这样方可避开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

杉田对亚洲的认识产生了明显的转向。杉田的这种认识转换，也许是在目睹了中国的现状后对中国产生失望和蔑视，以及领略了西方近代化的实际后形成的。杉田并没有看到中国政治和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即这是因为西方列强将中国置于殖民地状态，加之长期的封建专制所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衡所致。与西欧的近代化进行对比，他只不过从表面上阐述了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中国的现实。

杉田的根本主张是，既然西方列强将弱国作为资源供给地积极进行殖民地经营，同样，日本为推进近代化，也应把侵略中国、朝鲜作为重要的手段，以加速实现西方式的近代化目标。这无疑已是赤裸裸的侵略思想。

正如杉田这一主张所表明的，要在牺牲亚洲的基础上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说为实现“一国繁荣”的国家利己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可以说这种侵略思想是通过近代化理论培植起来的。

尽管最初的动机是要抗拒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但渐渐演变为以牺牲亚洲为手段，通过夺取亚洲实现日本的近代化目标。可以说，这种观念被日本作为一种正当的理论确立了下来。

侵略亚洲大陆先是作为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进而又增加了为实施日本的近代化对外侵略扩张的内容，即所谓“为了近代化的侵略”之观点。不仅是民权论者持有这种观点，它也被统治阶层以及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

援助朝鲜论的登场

大陆侵略思想总是以对中国的蔑视或歧视情绪为基础的。大井宪太郎⁽¹⁵⁾十分了解欧洲近代思想，在日本国内以自由党左派理

论家著称,他本身也成为侵略大陆论的鼓吹者。

大井支持朝鲜独立党,为推翻朝鲜封建统治,在朝鲜扩大民权运动,策动了大阪事件⁽¹⁶⁾。在他看来,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民权论的扩大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推翻剥夺人们自由的专制权力,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人类普遍的课题。基于这一认识,他策划了支援朝鲜独立党的活动。然而,因大阪事件被捕入狱的大井,在明治宪法发布恩赦获释后,他对中国的歧视观念也开始增长,并发展为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思想。

大井与杉田在认识上的共同之处是,他也主张为了抗御西方列强日本应在亚洲大陆建立霸权统治地位,占领大陆是日本的必由之路。可见,其亚洲侵略思想与杉田如出一辙。

在此,介绍一下大井所持有的朝鲜观。大井支持朝鲜独立党,其本身有各种各样的意图,不过,其最大的愿望是想要拯救受专制压迫、深陷苦难之中的朝鲜民众。下面的记述表现了大井的这种观念,他说:“朝鲜的风俗与极其野蛮的阿弗利加人(注:非洲人)类同,是一人有罪、祸及三代的野蛮国。”他还写道:“朝鲜无论是作为支那的属国,还是作为独立国,与东洋整体上没有利害关系。”他预测到朝鲜独立的情况下,俄国不必顾及与清政府的关系,可能会向朝鲜发起侵略。对于朝鲜的独立,大井主张最重要的是要向朝鲜民众提供支援(丝屋寿雄《大井宪太郎和初期社会问题》,青木书店,1961年)。

无论是杉田还是大井,最初都是主张通过扩大民权思想推翻封建专制权力的,但最终出于对朝鲜、中国的歧视,为了对抗西方列强和实现日本的近代化,将对亚洲的侵略行为正当化。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的观念发生逆转呢?

探讨日本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对亚洲的认识向侵略思潮转化的原因,樽井藤吉⁽¹⁷⁾对亚洲的认识颇具参考性。樽井在他的代表作《大东合邦论》(1893年)中表现的亚洲观与明治中期以来出现的大陆侵略思想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然而,从本质来看,其中也含有向侵

略思想转化的一面。樽井首先就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日本以重和作为经国的目标。朝鲜以重仁为施治的准则。和与物是相合的缘由，仁与物亦出于同源，由此，两国亲密之情本来出于天然，不可阻止。”（竹内好编：《现代日本思想体系·亚洲主义》，筑摩书房，1963年）。

这是从儒学素养中导出的日朝关系论。樽井主张，两国存有共同的、自然的或者说先天的联系，这远远超越了文化和民族的差异。两国进行协作及联合不应受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国家观念的束缚，而是近似于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他主张，为了两国的发展，两国将来的“合邦”是最佳途径。出于“想要得到二国合邦的成果而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如确定名称时会由于地位而损害彼此感情”之理由，将其国名命名为“大东”。

樽井还针对与朝鲜“合邦”对日本不利的言论，进行了反驳。他说：“虽说朝鲜贫弱，其面积是我国之半，其贫穷是因制度不善，如果实施联合，革其弊端，将会期待其富裕。”这反映了与侵略朝鲜的观念并不相干的平等观念。另外，与大多数亚洲主义者的认识相同，樽井将朝鲜未近代化的原因归结于受儒家伦理和道德观支配的封建制束缚，并不是在于其民族性。

关于与中国的关系，他也进行了如下论述：“纵观竞争世界的大势，亚洲同种的友好国家应该联合一致，与异种人竞争。要联合的国家，不仅限于日韩，也希望有清帝国。现在与清帝国应该达成谅解。”

他还进一步指出，虽说清帝国和日本的“合邦”为时尚早，但是“我日韩宜先合，而与清国‘合纵’，以御异种人之侮”。因为清帝国内部有异种民族的纷争及对立，鉴于此日本及韩国不宜与其“合邦”。不过，可以提倡“合纵”的战略，即日本和清帝国通过缔结同盟强化两国关系，形成亚洲两个大国共同抗御西方列强的态势。

这些姑且不论，在樽井阐述其主张之时，是明治政府最初的对外侵略战争，即围绕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与中国进行的甲午战争

(1894—1895年)开战的前一年。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的时机值得注目。

重新对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日本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为什么没有坚持樽井提倡的亚洲联合论的主张,而是转化为大陆侵略思想的呢?通过对其论点进行深入分析,对更好地理解樽井的思想本质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强国日本”的印象增强

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樽井的上述“合邦”和“合纵”论,是作为一种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侵略的思想展开的,并不是为使亚洲人民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战略构想。樽井主张与朝鲜、中国构筑关系,不是真正出于将亚洲人民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也就是说,为了同西方列强进行对抗,最优先的课题就是要把亚洲各民族团结起来,形成以日本为盟主的强大国家。可以看出,樽井的“合邦”论和“合纵”论,是在无视亚洲人民的诸多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可以说以樽井的“合邦”和“合纵”论为代表,所谓的亚洲联合论并不是以争取民族平等为亚洲联合的出发点,而是以伸张日本国家利益为根本的需求,这正是几乎所有的亚洲联合论演变成大陆侵略思想的主要原因。

樽井的“合邦”和“合纵”的概念,日后被衍化为“共荣”的战略思想,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观念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成分。“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明显地体现了樽井藤吉对朝鲜、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观点,基本上是以樽井藤吉所提出的诸论点展开的,而推进方式则是采用“侵略主义”的模式,以军事武力来实现。

以“东亚亲和”名义面世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与樽井的主张同样,强调实现日本与朝鲜、中国的自然而然的“合邦”及“合纵”关系,标榜“兴亚”的理想,获得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共鸣。

甲午战争被视为分别代表新旧文明的日本和中国的对决。在这方面,有论述新文明必然超越旧文明的内村鉴三(1861—1930年)的“义战论”。另外,福泽谕吉(1835—1901年)著名的“脱亚论”⁽¹⁸⁾引入了对文明优劣的评判,他积极主张脱亚入欧、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把甲午战争描述为“文明的正义之战”。随后,在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以及日本的大陆政策推进者之一后藤新平⁽¹⁹⁾的《日本膨胀论》(1916年)等著述中,可以说都包含着同一性质的侵略思想。

德富苏峰继承了福泽谕吉的文明战争野蛮的论说,鼓吹甲午战争的意义,站在所谓文明的立场上,给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披上正当化、神圣化的外衣。德富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是欲实现日本“一国繁荣”的国家利己主义。

在“大陆政策”研究史上,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具有文明思想的“亚洲联合论”和含有侵略扩张思想的“大陆政策”有不同之处。值得深思的是,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中国和俄罗斯为转折点,“亚洲联合论”恶性发展成为亚洲侵略主义,以这一演变过程为视角的研究值得注目。通过把握原本具有文明思想的“亚洲联合论”与彰显侵略思想的“大陆政策”的不同,可以充分理解其向侵略思想转化的原因。

作为含有文明思想的亚洲联合论,最终为“义战论”⁽²⁰⁾中的战争观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且随着日本的渐趋强大,日本要在亚洲共同体中确保盟主地位的意志日趋增强,亚洲联合最终成了日本以武力向东亚区域扩展自己势力的“大东亚共荣圈”。

不言而喻,日本最初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对以后侵略思想的展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甲午战争是围绕占领朝鲜半岛与中国展开角逐而引发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日本由此获得了对朝鲜半岛事实上的统治权,明确了大陆政策的框架,朝鲜半岛被确立为日本进攻大陆的桥头堡。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日本摆脱了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或压制的处境,朝着与西方列强同一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转变,对亚洲国家和地区四出侵略、恣意践踏。

从幕府末期开始的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思想,在甲午战争中不再是议事桌前的空论。日本凭借军事力量将昔日的梦想付诸实践时,不仅是大陆扩张政策的鼓吹者,而且在许多普通国民心目中,“亚洲强国日本”的意识也突然增强,这是不难想象的。

对韩国、对亚洲认识的构造及特征

以上,概括了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的系谱,阐明了亚洲联合论所包含的侵略思想的构造和特征。最后,再就以下两点加以强调。

第一,亚洲联合论所包含的侵略扩张思想,并不一定采用赤裸裸的军事至上主义。相反,为了避开和掩饰侵略的意图,较多地使用了与文明以及文化有关的用语和表述,这种伪善的手法使国民不能清晰地认识侵略的事实。因此,国民很容易被侵略战争的动员所蛊惑,积极地接受侵略思想,并支持和参与侵略行为。

第二,侵略思想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确定了下来,并被视为提高日本政治地位的根本手段。与欧美列强相比,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处于劣势,为了消除对欧美的劣等感,日本加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以侵略和牺牲亚洲换取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决定了日本侵略思想的基本构造。

二十世纪40年代开始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主导东亚而构想的巨大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极其虚幻的,然而,要创建一种理论或思想来彻底消除这一空虚的幻想又是十分困难的。至今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还在迷醉着一些人,可见其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我认为,如何创建一种新的理论,并对亚洲联合

论中隐含的侵略思想进行彻底深入的剖析，是一项持久的课题。若非如此，就很难产生有效的对抗性的理论来抑制继续散发毒素的侵略思想，难以抵制以新的伪装出现的法西斯主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侵略性的思想文化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帝国意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孕含着新国家主义要素的国粹主义抬头，它与军事国家和军国主义结合起来，多少有向新的侵略思想发展的危险性。为此，如何彻底铲除战后的军国主义势力将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日本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是推进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对此，日本人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过去的历史呢？遗憾的是，战后60多年过去了，日本许多政客和普通日本人已经忘却了侵略战争的历史，抹煞了历史的记忆。我们必须从过去的侵略战争中汲取历史教训，正视历史事实，也就是努力恢复历史原貌。那么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和日本人，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呢？这其中存在着诸多原因，主要包括：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进行了错误的总结；战后日本所处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就是说，日本战后的保守政治与美国的军事战略紧密地融为一体；再就是日本特有的政治文化等问题。在此，就战后日本人不能深刻地认识和反省侵略战争，尚未清算殖民统治历史问题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至今在日本社会依然广泛地流行着“殖民地近代化论”，说什么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对殖民地及亚洲各区域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殖民地近代化论者，不仅主张日本对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鼓吹什么扩大了殖民地的人权及推进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他们声称日本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台湾和朝鲜的“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甚至认为，在“一视同仁”⁽²¹⁾的统治理念下推行“皇民化政策”，通过日本的殖民统治将台湾人和朝鲜人的“素质”提高到“日本人的水准”，所以是“消除”歧视和差别的社会运动。为什么至今依然存在诸如此类的荒唐逻辑和言论呢？这些言论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

生的呢？我认为，其中有两点是极其重要的。

其一，就是帝国日本的历史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帝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形成了国民国家，之后确立了全民皆兵制度，取得了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成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以这两场战争为契机，日本将台湾和朝鲜占为已有，日本成为殖民地领有国，日本人对殖民地的认识几乎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台湾和朝鲜虽说是殖民地，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将其视为日本的领土。英国、法国等拥有殖民地的欧美各国，在国民国家形成和殖民地领有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而日本则有所不同。

欧美的殖民地与本国相距遥远，历史文化及风俗等也都大不相同，不能将殖民地纳入国民统一的对象。而日本将与本国邻近的台湾和朝鲜占为殖民地，加之日本领有台湾和朝鲜时，比起经济上的利益，更加注重其在军事上有利的地理位置，因此否定了曾一时考虑的间接统治方式，采用了由总督府直接统治和皇民化政策⁽²²⁾。特别是在殖民地台湾，将其视为介于正式领土和殖民地之间的位置。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人也成为动员参战的对象，在台湾全面推行日语教育等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政策。而在此之前的语言政策方面，是将日语教育与本地语教育并重实施的。

其二，日本人对于殖民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回顾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面对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入，日本力图作为国民国家实现自立，同时为了打破封建制度，加速实现近代化，在周边设定军事缓冲地带。日本政府认为领有殖民地是必不可少的，将加速国家近代化和领有殖民地这两大课题作为互为表里的双重目标确立了下来。也就是说，国内实现近代化和国外领有殖民地成为重要的国策，领有殖民地被视为实现近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凡此种种，正如神奈川大学尹健次教授在《民族幻想的挫折》（岩波书店，1994年）等著作中所指出的，属于近代化所孕育的殖民历史的暴力性。

日本国内，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暴力性明显地增强，

并通过立法使之正当化,同时对外扩大殖民地的欲望不断地膨胀。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靠暴力来维持和发展。正因如此,急于实现近代化的帝国日本的暴力性表现得格外显著,在国内建立了统一管制、压制的体制,实行精神总动员,对外则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

歪曲对韩认识的“殖民地近代化论”

何谓“殖民地近代化”?近年,关于殖民主义理论中频繁使用的“殖民地近代性”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化是不断地使暴力性内在化的过程。在这一方面,虽说同是殖民主义,但是日本殖民主义与西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将暴力性内在化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大多数遭受压迫或压制的日本人自身没有培育和树立一种批判“殖民地近代性”的精神呢?可以说这正是问题所在。我认为,其理由无非在于天皇制(绝对主义天皇制)或者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统治体系。

正如尹健次指出的:“天皇制是日本形成国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决定因素,在日本实现对外独立和国内近代化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尹健次著:《在首尔所想到的》,平凡社,2003年)。由于天皇制意识形态对国民的洗脑,国民对天皇及天皇制国家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即所谓的“国体精神”。加上国民作为殖民地保有大国的自负心,很容易将自身遭受的暴力和压抑转向他民族。也就是说,日本人对亚洲各国人民的蔑视和歧视所表现出的极大的暴力性,是将压抑的情感向外转移的表现。这正是帝国日本在不断重演的对外侵略战争以及殖民统治过程中,对他民族大肆虐杀、施暴的原因。对此,日本人至今依然没有深入检讨和反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日本人没有自觉地认识到殖民地近代化包含的暴力性;第二,

日本人没有从掩盖这种暴力性的天皇制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正因如此,日本国内不断地老调重弹,继续鼓吹殖民统治正当化的荒唐言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亚洲解放战争”⁽²³⁾,并炮制出殖民统治促进了殖民地近代化的理论,即所谓的殖民地近代化论。像这类问题,总体上都可归结为历史认识问题。在此,有必要运用殖民主义及殖民地近代性的概念,进行深入考证和分析。

在揭露“亚洲解放战争”论的论述中,台湾都市史、建筑史研究者夏铸九发表的“殖民地近代性之构筑”一文(《现代思想》,2001年)引人注目。其中,作者使用了“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概念,指出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后依然模仿殖民统治者的价值观和精神,殖民状态却未能解除。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另外,在台湾,“日本精神”一语以多种涵义被滥用,如果是以称赞、肯定的口气来说的话,也就是夏铸九所说的“殖民现代性”的表露。

朝鲜与台湾同样,曾一度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但并不存在相当于“日本精神”的朝鲜语。在韩国,频繁地使用“克日”这一口号。朴正熙政权无条件地接受了日本近代化的模式,努力以日本式的经济发展为目标,在此意义上,“克日”这一用语表现了要追上或超越日本的经济成长。

“日本精神”促使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台湾提倡日本精神的主张是,如果台湾致力于近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话,台湾人也必须模仿战后日本取得近代化并使日本迈向经济大国的日本人精神。然而,如果将此视为“殖民现代性”的表露的话,正如夏铸九所指出的,那就是一种“主体缺席的殖民现代性”。台湾市民社会的构筑,必须是在摆脱了暴力和压制的基础上,充分体现独立自由及自治精神。若以“日本精神”为前提的话,在缺少主体的社会里,就会导致自我封闭的结果。台湾社会散布肯定日本的殖民统治,或者日本的统治加速了台湾近代化(=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言论,只不过是夏铸九所说的“殖民现代性”罢了。

此外,宫本正明(立教学院史资料中心)在“殖民地和‘文化’”(《季刊现代史》第10号,2005年)一文中指出,朝鲜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所带来的殖民压抑与近代性,在朝鲜摆脱殖民统治之后依然被继承下来,需要从殖民统治者所主导的既压抑(殖民性)又发展(近代性)的两方面来批判地把握‘殖民地近代性’(著者注:不是殖民现代化)”。

殖民地近代化论的鼓吹者,对近代化孕育的暴力性和压制性缺少自觉认识或理解。日本自“合并”朝鲜将其纳为殖民地后,朝鲜总督府实施靠宪兵警察武力镇压反对派的“武断政治”⁽²⁴⁾,遭到朝鲜民众的反抗和抵制。1919年“3·1独立运动”爆发之后,朝鲜总督府必须改变策略以分化并弱化朝鲜人的民族运动,统治方式从“武断政治”改为“文化政治”。齐藤实就任朝鲜总督后,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文化统治”。

所谓“文化统治”,是原敬内阁提倡和推行的“内地延长主义”,即在朝鲜殖民地推行日本近代各项制度。该时期实施了类似于日本民主改革的殖民地改革,或者说促进殖民地近代化的举措。当时发行了许多朝鲜语报纸,在此过程中,许多朝鲜知识分子默认或接受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金玉钧、徐载弼等启蒙思想家容忍日本的殖民政策,努力实现朝鲜的近代化。所谓“文化统治”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削弱朝鲜民族性的政策。战后,韩国社会对殖民现代化思想进行批判,这是韩国社会及人民与殖民现代化诀别,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自主现代化的标志。

但是,从战后韩国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并不能说完全清除了殖民现代化思想的影响。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²⁵⁾实施维新独裁体制,在韩国全面实施了威权统治。朴模仿了日本殖民时期的一些统治手法,这意味着韩国也和台湾一样,自朴政权开始的三代军人总统⁽²⁶⁾时代是“内部殖民地化”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朝鲜)的政治经济关系,当然不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日本依然没有反

省过去的殖民统治,同时,在韩国和台湾,也没有积极地采取抑制措施来消除内部殖民地化。

日本人在说起台湾是“亲日”地区时,那不过是赞赏殖民主义的表白。台湾人在缅怀日本殖民时代,称赞那段时光是“好年代”时,不过是内部殖民地化的无意表露。如果我们要实现以自由、自治、自律为基本原理的市民社会,就必须批判和澄清殖民地近代化的实质,而不是盲目地遵从。我们一直反复强调殖民地问题,是为了创造一种超脱“错误的近代化”的新的伦理,以消除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在英、法、荷等西欧列强放弃殖民地经营以及日本因战败从占领地或殖民地撤退时,即摆脱了宗主国的束缚,成为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去殖民地”的同时,也有一些殖民地的社会文化体系发生明显变化。比如,由于殖民地时代瓜分统治的结果导致的民族对立,以及精英与民众的贫富差别,或者在经济上对旧宗主国的依从等。除此之外,还有如前所述的容忍殖民体系的内部殖民地化问题。

这种内部殖民地化或者殖民现代化,美化或肯定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功绩,这也使得日本国内的“亚洲解放战争”鼓吹者更加嚣张。毫无疑问,在日本,至今依然没有明确战争责任问题,换言之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这是出现“亚洲解放战争”论的根本原因。

“历史和解”的途径

以上,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日本人对韩国认识的变化过程及背景。日本、中国、韩国之间相互的历史认识差距甚大,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不能正视历史事实,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可以说,历史认识差距

成为修复日中、日韩关系的最大障碍。如何消除历史认识上的差距？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值得我们深刻检讨和反思。

达成共同的历史认识不可缺少的就是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国史观”，寻求“历史和解”的途径。我认为，所谓历史和解，就是抚慰受伤的心灵，与亚洲国家及人民重新构筑起信赖关系。在端正历史认识的前提下，加强与亚洲各国之间——特别是与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之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消除隔阂和对立，为实现亚洲地域无核共同体、构筑“亚洲共同的家”作出不懈的努力。

当然，并不是说战后日本没有为取得历史和解做出过任何努力，但是从政策上来看依然没有明朗的迹象。事实上，日本在冷战时期虽获得高度经济成长，但在亲美保守体制下，对于那些遭受侵略战争破坏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战后恢复，一直采取漠然无视的态度。日本政府公开声称，以 ODA（政府开发援助）的方式变相支付了战争赔偿，所以日本国民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已经向战争受害国及其人民进行了战争赔偿。

但是，众所周知，日本 ODA 提供的开发援助资金大多用于被援助国基础设施的整备事业，而承接这些建设工程的几乎都是日本企业。可以说在当地很少将这种援助方式看作是实际上的战争赔偿。

也就是说，日本 ODA 不是对遭受战争破坏和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进行的补偿和支援，只不过是在促进被援助国经济发展这一大义名分下，用于日本企业的活动资金，这与受害国人民要求战争赔偿的意愿是完全不相符的。正因如此，以冷战结束为契机，亚洲各国掀起自由化、民主化浪潮之后，要求日本清算历史和作出赔偿的呼声强烈。冷战时期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体制，压制了民众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呼声。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要求本国政府重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殖民统治责任的呼声爆发出来。

但是，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虽然表面上重复着“谢罪声明”，但

并没有采取使亚洲各国人民可以接受的具体行动。更确切地说,正因为日本政府没有以真诚的姿态接受来自亚洲各国的批判,才更加激发了对方要求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和抗议行动。

不仅如此,正像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所显示的,日本一些政客无视亚洲国家及人民的抗议,荒诞剧一次次重复不断地上演,好像故意挑起事端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非常遗憾,冷战结束后日本一直不能抓住机会进行“反省过去”和重新评价过去的历史,所以一直无法赢得亚洲各国人民的信赖和尊重。

从日本国内危险的政治倾向来看,日本正在放弃与亚洲国家和地区实现历史和解的机会,如此下去日本在亚洲必将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不仅得不到亚洲国家及人民的谅解和信赖,也将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

为了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重新构建信赖关系,希望日本政府积极地寻求修复关系的途径。当然,大前提就是日本政府必须勇于承认历史事实,深化历史认识,并做出令人信服的实际行动。

现在,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我们需要冷静地思索和面对这一现实,不断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我认为,针对中国和韩国抗议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不能只用一句“干涉内政”来为自己辩解,而是应该扪心自问:对方为何抗议?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日本政府和国民需要重新认识这些抗议的原因,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围绕竹岛主权争端,韩国民众举行反日抗议集会等,对此,日本方面指责说韩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正是日本政府不能正视历史的行为,激起了韩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举行集会以示抗议。我认为日本方面应该正确地看待和理解这种反日民族情绪,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可滥用。

也就是说,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亚洲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反日游行或抗议集会活动是极其重要的。日本方面应该自我反省,自身不能

端正历史认识和反省战争责任是导致韩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这是对日本失去信任和产生怀疑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又被称为“反日”或者“嫌日”的民族主义。为此,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冷静的态度及切实的行动来平息和缓和这种反日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间形成了多层次纵横交错的文化基础,同时又各自保持其独有的文化。现在的外交若仅仅以政治力和经济实力为前提的话,那么只能产生由政治力的强弱所决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或者“侵略和防卫”的对立关系。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相互的“文化力”(cultural power),尊重各国独自的文化或文化遗产,并关心和理解其中的差异和异质性。通过寻求彼此间文化的相似性或同质性,积极开展文化外交也是增进沟通、建立信赖关系的重要途径。

当然,这种文化外交方式伴随着一定的危险性。过去日本在实行殖民统治时,提出“日鲜同祖论”来强调统治对象国和日本之间的共同性,企图防止被统治人民的反抗和抵制。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以抹煞朝鲜文化为前提的“文化融合”。遗憾的是,战后日本既不肯“反省侵略历史”,又未能“端正历史认识”,即使提出以文化外交构建新关系的设想,也难以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理解和赞同。

正因如此,为了取信于亚洲人民,为了和亚洲近邻建立信赖关系,日本必须真诚地反省侵略历史,努力与亚洲国家实现历史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修复和改善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才能与亚洲各国人民友好、和平相处。

注释:

- (1) (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原是朝鲜半岛上朝鲜与韩国之间的民族内战。之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分别支援韩国和朝鲜双方,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战争,死者及

下落不明者超过 200 万人。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按美国的“特需”订单,为美军提供军需物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令日本组建“警察预备队”(日本自卫队前身)。1953 年 7 月 27 日,由美国代表的联合国军司令官、朝鲜人民军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三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至今依然维持该协定的效力。

- (2) 1952 年 1 月 18 日,韩国总统李承晚称为了宣示海洋主权范围,在日韩两国之间的日本海公海海域上划定了这条界线,禁止外籍渔船进入。日本渔船不得进入从济州岛附近到对马海峡的渔场内捕鱼。
- (3) 日韩竹岛(朝鲜、韩国称独岛)争端引发之后,9 月 29 日—10 月 1 日《每日新闻》和《朝鲜日报》共同进行的调查(1999 年以来第五次)表明,回答日韩合作“需要加强”的比率,日本为 67%,韩国为 50%;回答“对日本/韩国亲近感”的比率,日本为 47%,韩国为 36%;回答“没有亲近感”的比率,日本为 47%,韩国为 61%。
- (4) 丰臣秀吉实现全国统一后不久,开始向朝鲜扩大领地,以消除各地大名对土地分封的不满等。1592 年集结 15 万大军入侵朝鲜,1597 年集结了 14 万大军再次入侵朝鲜,由于遭到各地义勇军和李氏朝鲜军激烈抵抗,1598 年丰臣去世后,日军从朝鲜撤出。
- (5) 吉田松阴(1830—1859),江户幕府末期的尊王论者、思想家、教育家。生于长州藩萩城(山口县萩市)。1854 年因偷渡上美国舰船,以违反锁国罪入狱一年。1855 年出狱后,兴办松下村塾,培养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倒幕维新领导人。
- (6) 林子平(1738—1793),江户后期的经世家。在他的著书中记载朝鲜、虾夷、琉球的地理状况,提出了作为岛国的日本必须加强海防的主张。
- (7) 本多利明(1743—1820),江户后期的经世家。他建议幕府开发虾夷地区,并通过与西方进行贸易提升国力。
- (8) 杉梅太郎(1828—1910),江户幕府末期、明治时期的武士、教育者。吉田松阴的哥哥,生于长州藩萩城。
- (9) 1854 年 3 月 31 日签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条约中规定日本开放下田与函馆两港口与美国通商、日本有义务援救遭遇海难的美国船只及人员、日本保证向途经开放口岸的美国船舰提供煤炭燃料等所需物质、美国外交官进驻下田等。同时还规定日本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以此条约,日本开启了两港口,日本锁国体制就此崩解。
- (10) 桥本左内(1834—1859),幕末志士、思想家。出身于越前福井藩。基于富国强兵论,他积极主张开国贸易、拓殖产业、增强军备等,推进藩政改革。此时他敬仰宋朝岳飞,取号为景岳。

- (11) 村田氏寿(1821—1899),幕末、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出身于越前福井藩。
- (12) 大隈重信(1838—1922),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家,出生于肥前锅岛藩(佐贺县)。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1873年反对征韩论。通过三菱商社介入军事运输,政府与三菱保持了密切关系。围绕北海道开拓使官有物私有化事件,与过去的盟友伊藤博文等长州藩以及萨摩藩势力产生对立,1881年被罢免官职(明治14年的政变)。
- (13) 板垣退助(1873—1919),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出生于土佐藩(高知县)。因征韩论失败而离开明治政府。1874年提出民选议员成立的建议书,由板垣等人发起,次年成立全国性社团——爱国社,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1898年,自由党和以大隈为党首的进步党第一次合作组成宪政党内阁,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党内阁,由大隈任总理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
- (14) 杉田鹁山(1851—1929),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本名定一。1878年与板垣一起重建爱国社,自由民权运动领导人。1884年开始至1887年,赴中国、欧美考察。
- (15) 大井宪太郎(1843—1922),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以大井的政治演说为契机,埼玉县秩父自由党成立。
- (16) 1885年为了重兴自由民权运动,另辟政治改革蹊径,大井宪太郎等原自由党员左派支持朝鲜改革派,计划渡海到朝鲜半岛实行暴动,以立宪制在朝鲜建立独立政权。大井等人在渡海去朝鲜之前,在长崎和大阪被捕。
- (17) 樽井藤吉(1850—1922),明治时期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因大阪事件被捕入狱。
- (18) 是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日本报章《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著名短文。其部分内容如下:

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本与我国旧制无异。或人种之异,或虽同师所授,所得不同,三者相较,彼二国何其相似乃尔,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

处当今之世,於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

愚以为,彼二国者,于今文明东渐之际,保全疆土尚力有未逮,若非突起智者义士,效法我朝,革旧弊,聚民心,则不出数年,彼定国将不国,自裂其土以供文明诸强分而食之。

当西洋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际，彼二国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闭，实属不智。虽云“唇亡齿寒”，然彼于我无丝毫之助。非特如此，盖因地理相连，西人或将我与彼二国等量齐观，是故鄙彼即非我也。如彼无法可依，西人疑我亦无法也；二国无知，西人谓我亦如此；彼等卑屈无耻，西人则视我之侠义为无物；韩人刑酷，西人思我亦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比如邻庄之人皆无法无天，愚昧残暴，偶有一二品行端庄者，亦不免受其累也。如斯例也，今之彼二国于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

- (19) 后藤新平(1857—1929)，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家。1898年被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提拔，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他擅长殖民地经营，在台湾发展轻工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糖业等，促进了台湾糖业及樟脑业的发展，并推进了铁路等交通建设。1906年出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为了推进大陆政策，主张联合俄国，与俄国携起手来共同瓜分中国。
- (20) 西方将战争的性质区别为“正义”和“邪恶”，义战是指为了阻止战争的惨祸等，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义战与圣战在概念上有所不同，需要区分。
- (21) 本来是指对所有的人同样看待，“同施仁爱”的意思。日本在侵略中国、朝鲜、台湾及实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推行皇民化运动，冒以“一视同仁”之名，推行殖民同化政策。
- (22) 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期间，为了强化战时体制，动员朝鲜人支援日本的对外战争，在朝鲜实施皇民化政策。日本高喊“内鲜一体”的口号，要朝鲜民众宣誓作为日本天皇的臣民，效忠天皇，并要求朝鲜民众背诵“皇国民誓词”；禁止学校教朝鲜语，强迫朝鲜人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还强制“创氏改名”，要朝鲜人改为日本姓氏。
- (23) 该理论鼓吹日本对外扩张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为了争取亚洲解放的战争。
- (24) 日本在台湾和朝鲜，残酷镇压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朝鲜，日本实行宪兵与普通警察一体化，即宪兵警察制度。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密布各地，针对各地展开的反日义兵斗争，日本政府不仅派宪兵、警察，而且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 (25) 1960年的四一九学生革命，迫使李承晚总统辞职。1961年5月15日，朴正熙少将发动军事政变，以不到4000人的兵力夺取了政权。
- (26) 他们是韩国前总统崔圭夏(1979年12月8日—1980年8月16日)、韩国前总统全斗焕(1980年9月1日—1988年2月24日)、韩国前总统卢泰愚(1988年2月25日—1993年2月24日)。

终
章

尚未解决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问题
寻找解决领土问题的突破口

历史和解以历史认识为前提

自日韩合并到现在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然而,因战后日本一直没能很好地检讨和反省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在论述日韩合并时,至今日韩合并是正当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在此,我想再次提醒的是:日本政府必须端正历史认识,真诚地面对历史,不断反省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

依据当时的国际法,围绕日韩合并的正当性,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北朝鲜之间展开论争。直至今日,日本持正当论的主张居多,即使在比较自由的学者中间,强调殖民统治正当论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是,恕我直言,继续固守日韩合并条约是正当的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日本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是违背国际法,是采取不正当、非正义的手段强制实行的。

尽管如此,从现实来看,战后日本许多政治家、官僚以及知识界人士不断地发表言论和著说,主张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因此,在日韩合并条约签署过去 100 多年的今天,仍然有必要继续提出这一问题,以促使日本国内那些歪曲历史和推脱侵略战争责任的人进行反思和自省。终章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日本不能端正历史认识的原因,这也正是日本与亚洲周边国家不断引起摩擦和争端的根源。

首先,我想要指出的是,为什么日本战后一直没有解决好历史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战后没有将清算战前的“历史罪行”和反省战争责任作为重要的课题和新的出发点。

不能检讨和反省自身的加害罪行、不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和民族,终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仅指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也包括反省历史的过程、方法及成效。

历史事实不仅是人们需要掌握的知识,能否端正历史认识、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未来及日本在亚洲人民心中的形象。历史认识浅薄,不尊重历史,不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还可能会导致严重而错误的后果,使日本在亚洲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然而,要解决历史认识浅薄的问题、深化历史认识,又并非易事。过去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的日本,能否与遭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达成历史和解,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历史认识问题是我们今后必须认真面对和反思的重要课题。

深化历史认识,与周边国家消除隔阂和对立,达成历史和解,这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和分歧,只要消除过去的分歧(战争和对立),达成“历史和解”,就一定能推进亚洲和平的进程。

谁来承担殖民统治责任?

日本帝国在台湾和朝鲜强行实施殖民统治,事实上在其建立的“满洲国”同样也施行殖民政策,为继续侵略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是表里一体的,因此,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需要统一把握和分析。那么,谁来承担殖民统治和战争的责任呢?需要我们再次进行检讨和反思。下面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分类说明。

第一,直接挑起战争的日本军事机构及军事官僚。日本资本主义靠武力扩张来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这是近代日本自建立之初就形成的体制。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意识到自身还远不具备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实力,只有通过军事扩张进行经济掠夺增强自身的实力。军事机构和军事官僚则是对外发动侵略扩张的旗手。在他们看来,为了实现构筑大陆国家的梦想,朝鲜具有极其重要

的战略位置。这也是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的基本设想。

朝鲜半岛是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向中国大陆扩张的桥头堡。因此,与台湾总督不同,朝鲜殖民统治的最高统帅——朝鲜总督,一直由陆军军人担任。

第二,支持和促成侵略扩张及殖民统治的日本财界及财阀。日本一方面依靠欧美的资本、技术,一方面加紧对亚洲落后国家进行压制和经济掠夺,成为具有双重性格的帝国主义国家。昭和初期,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论开始抬头,试图摆脱这种双重帝国主义的体质。在这种理论的主导下,促成了日美开战。

在实行朝鲜殖民统治时,日本氮气、日产等新兴企业集团在朝鲜半岛展开经营,在朝鲜总督府全面支持下,政府、军队和产业紧密联合,企业生产经营稳定高效,从朝鲜掠夺了大量的资源。

第三,领导日本资本主义和军事机构的天皇及其宫中集团。天皇及其亲信组成的宫中集团,本来以亲欧美派居多。日本将台湾和朝鲜置于殖民统治之后,自满洲事变开始,天皇及宫中集团对欧美的态度渐渐变得低调,他们反对与英美协调的传统的外交路线,主张门罗主义,容忍军部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存在,纵容军部的恣意妄为。

第四,从侧面支持和声援侵略战争的官僚机构、学界、司法界、新闻界及右翼团体等。其中,战后官僚机构(以内务省官僚为中心的支持天皇制的保守体制)成立了“大霞会”(以战前旧内务省官僚为中心组成的保守政治团体),导致战后日本社会保守体制延续、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的状况。这些政客们构筑了战后的保守体制,并决定了日本的发展方向。这些保守体制的政客,不断地鼓吹殖民地近代化论,强调殖民统治的正当性。

第五,拥护和响应侵略扩张政策的日本民众,他们本身有强烈的帝国意识及对亚洲国家的歧视和偏见。中日全面战争时期,日本民众表现出积极支持侵华战争的热情及对中国的蔑视。日本国民有强烈的排外意识,这是近代国家成立后日本通过学校教育及多种渠道

对国民施教灌输的结果。

正是日本国民这种排外的民族主义,支持和肯定了殖民统治,将日本推向了对外侵略扩张之路。历史表明,当时有大批日本人涌向台湾、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霸占当地居民的农田等作为生活资源。

以上对实施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主体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他们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各自负有的责任轻重不同。战后,这些发动和推动侵略战争的主体,对战争犯罪是如何进行总结和反省的呢?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人被定为战争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外,其他都不了了之,逃避了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

为什么日本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和反省自身应负的战争责任呢?下面将分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模糊不清

对于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日本人不能自觉地进行反省,历史认识非常淡薄。日本战败后,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检讨和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责,这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状。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原因。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使日本重新恢复主权的《旧金山和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以及《波茨坦公告》。1945年日本战败时,日本政府接受了追究战争责任的《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条款。其中包括“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六条);以及“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第十条)。强调必须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追究战争罪犯的法律责任。

但是,这些条款中,对于战争责任主体的表述含糊其词,极为暧昧。“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究竟指的是谁呢?由此,出现了两种随意的解释。一种解释就是,指领导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官僚,主要包括陆军主战派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等6人。因为这6名战犯在东京裁判中被判处死刑,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而对于东京裁判以外的战争罪犯,事实上对其放宽或免除了战争责任的追究。因此出现了另一个解释就是,既然战争责任的罪魁已受到了惩罚,其他没受到惩罚的人应该是无罪的。同时,该公告没有涉及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日本国民也应视为战争受害者的解释。由此以来,许多日本国民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对于自身排外的民族主义和支持侵略战争的行为缺少反省意识。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日本国民的意识中,天皇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然而,事实上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就使追究战争责任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1945年8月10日,美国政府收听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随即征询英、苏、中三方意见,发表的一道复文中写道:“自投降之时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必须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这表明在盟军占领之后,天皇的统治权力将依然存续,这为免除天皇的战争罪责埋下了伏笔。

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实际上是出于某种政治意图,是为了在战后亚洲冷战体制下发挥天皇的功能。没有对应付最大责任的昭和天皇追究战争责任,这是导致未能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重大原因。

仅仅让一部分陆军激进派背负战争责任,国民对战争责任的认知自然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国民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表现出的残暴和歧视也没有得到检讨和反思。以至于现在,日本人对战争责任问题漠不关心,甚至称与己无关。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战争责任也需要讲求道义。日本在过去的

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过程中，残害了大量无辜，给亚洲国家及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他们遭受了极大的屈辱和痛苦。日本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是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身为日本国民的战后一代怎样认识侵略战争和历史罪行，也反映出做人的基本良知和道义。

战争责任问题，是权力的主宰者国民自身应负有的责任。国民是国家的主宰者，每个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应该认真地把握好这一权利。如果能抱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日本政府能不能真诚地对国家犯罪进行谢罪和补偿，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个日本国民自身的政治责任问题。作为战后一代，接纳近代国家的原理，并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家，那么就要自觉地承担起战争责任，为恢复日本国家应有的姿态做出不懈的努力。

暗中活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日本掀起了一股否定战争责任，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赔偿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到 90 年代，这种逆流越发泛滥，形成了一股不同程度上影响民众、改写历史的政治力量。这种“历史修正主义者”或者“历史否定主义者”，如今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历史修正主义者否定本来是创造历史主体个人，强调和肯定国家是管理、修正历史的主体。因此，若是有损国家利益的历史事实，就按主观意志极力进行辩解，并试图进行抹煞或隐蔽。

众所周知，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试图对纳粹主义的侵略这一昭然的历史事实进行隐蔽和歪曲。在美国，得到“压力团体”支援的“历史修正会议”等开展各项活动。在法国，以右翼政党“国民战线”为中心，提出“修正”法国共和制的历史。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活动也格外惹人注目。早在 70 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所

著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1972年)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对此,纪实文学作家铃木明在《文艺春秋》(1973年)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文进行了猛烈的反驳,试图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

即使最近,一些竭力否定历史事实的活动也十分猖獗。比如,原冲绳战场的指挥官及其遗族,针对大江健三郎著的《冲绳笔记》(岩波书店,1970年)所记述的内容,对作者大江及岩波书店出版社起诉,要求名誉损害赔偿和停止该书的出版。这是一起因评价旧日本军引发的裁判事件,虽然2008年10月1日大阪高级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但是原告仍不肯就此罢休,继续上诉最高法院。此外,日本思想史研究者东中野修道等,反复发表言论指责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夏淑琴的证言是虚构的,结果东京地方法院以名誉损害诉讼案开庭审判,2008年6月,东中野等南京事件否定派以败诉告终。

对于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否定毒气室的事实是关系到自我生存的问题。而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正在为构筑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活动,在他们看来,南京大屠杀是必须否定的历史事件。他们首先否定侵略战争这一事实,继而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将侵略战争改说成“亚洲解放战争”,其最终目的是要肯定和称赞日本的侵略战争。

日本多名历届首相以及许多执政和非执政党的政治家们公开参拜靖国神社,说穿了,这种参拜行为无非是想要修正历史。也就是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公开参拜行为都是企图将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亚洲各国对公开参拜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是歌颂军国主义、忘却战争犯罪的行为,其中固然隐含着想要修正侵略历史的意图。

不仅如此,在教育领域,现行的“教科书检定制度”也已使历史教育的目的和理念形同虚设,导致了“官制国史”的强行实施。换言之,“教科书检定制度”是以国家进行“历史一元化管理”为目的,采用检

定制度的形式将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变得“合法化”、权威化。由于这一制度的设立,使我们失去了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的机会。

如前所述,日本这一国家,作为“历史管理”者总是试图歪曲和隐蔽过去的历史事实。不仅有很多忠实于这一国家路线的政治家,也不断出现一些充当走卒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对此,决不可熟视无睹、等闲视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揭露他们歪曲、抹煞历史事实的行为。我们必须真诚地对待历史事实,端正历史认识,反省侵略战争责任,这是与亚洲近邻国家消除隔阂和对立、达成历史和解的唯一选择。

结
语

2012年9月21日,停放在岩国美军基地的12架鱼鹰(MV22)运输机开始试飞。鱼鹰运输机进行试飞之前,防务大臣森本敏夫和防卫省有关人士多次去山口县及岩国市与当地政府人员协商,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森本大臣不过是美国的“信差”,当地居民看得很清楚:日本的防务大臣重视的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日美关系,对于当地居民的安全漠不关心。

除此之外,防卫省官员还去冲绳进行交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的游说表明日美同盟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这一现实。一言概之,日美同盟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关系,是美国高高在上、日本绝对服从的隶属关系。无疑,为维护日美同盟,不得不迫使冲绳背负更加沉重的负担。此次防务省官员去冲绳进行交涉,其目的并不是去协商,只不过是传达政府的旨意而已,这是无视民情民意、向冲绳县民强行施压的行为。政府的这一表演充分表明日本依然是听从美国的摆布,日本政府反复强调的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实际上是为了迎合美国的亚洲战略目标。我想,这种有名无实的日美安保条约,大家早已看透真相了吧。

日本政府无视山口县和冲绳县居民的抗议,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在美军驻岩国基地和冲绳基地强行配备鱼鹰运输机,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美国国内军需产业界强烈要求,尽可能将投入了巨额资金研制开发出来的鱼鹰运输机在世界各地广泛配置并投入运行;第二,美国继续对亚洲地区施加军事压力,在日本配备能够快捷地运输大量军需物质的鱼鹰运输机是美国的亚洲军事战略的需要;第三,与第二条有直接关系,为了明确美军驻冲绳基地的重要性,配备鱼鹰运输机是绝好的机会。

美国坚持对亚洲的霸权统治,企图扩大和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全面配合,加强冲绳和岩国美军基地军事装备。问题是,日本政府和国民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按美国的意愿行事究竟意义何在呢?显然,日本政府及保守势力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军

事同盟来压制中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应该明确的是,根据美国地名委员会的资料记载,竹岛是韩国的领土。有关中日钓鱼岛争端,美国一直坚持中间立场。也就是说,美国的态度明确,不想陷入日韩、日中领土争端的漩涡,不会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介入。日本政府仍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就可压制中国和韩国。

去年日中钓鱼岛争端激化,日本政府认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就可牵制中国,最终将会按日本所期待的方式解决岛屿争端。民主和自民两党的代表,以及准备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候补人员异口同声地强调牵制中国的重要举措就是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日本这种对中国极力牵制和压制的姿态,将无法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人民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

在2012年9月26日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曾一度辞掉首相职务的安倍晋三获胜,再次就任日本总理大臣。安倍晋三极力主张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否定侵略战争等,为什么这种极端保守派能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再度成为日本总理大臣呢?我想很多读者也会对日本的政治状况感到无奈和绝望。

我们必须正视日本的现实,并为改变这种现状做出不懈的努力。具体地说就是阻止修改和平宪法和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废弃日美同盟和日美安保条约,并彻底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端正历史认识。通过这些活动,努力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增进交往,并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重新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

日本与中国、韩国领土争端的根源在于历史问题。尽管岛屿争端涉及周边海域的海底资源,但最大的原因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使日中、日韩关系陷入低谷。但是,要解决日中、日韩之间的问题,总归还要靠中日韩三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寻找解决的途径,企图依仗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过是愚蠢的妄想。

2012年10月26日,石原慎太郎突然辞去东京都知事,他就钓鱼岛问题发表的言论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谬论。他极力鼓吹要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好像是当今日本社会流行的口号,这与昔日在声扬国威的呼声下将日本推向战争的国情极其相似。

为抗议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中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反日游行。因近年中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等,不能完全排除游行示威者中有发泄不满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无视历史事实发出的严正抗议。

这些年来,我每年去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等地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资料调研等,有许多机会与当地的研究人员、大学生及市民进行广泛的交流。根据我的经历和体验,我认为,引发领土争端的原因不只是与政治、经济有关,主要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及许多日本人对中国、韩国、朝鲜的历史认识问题,直至今日,日本对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认真检讨和反省。

领土问题的另一个要因与战后亚洲冷战构造有关,本书简要概述了有关钓鱼岛和竹岛争端的历史原因。战后美国制定的构建亚洲秩序的旧金山和约中,对日本周边岛屿的主权,基本上是模棱两可,极其暧昧的。可见,美国居心叵测,蓄意在亚洲地区制造摩擦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毫无疑问,领土问题确实是政治问题,《美国的亚洲战略——领土问题》迟早会成为引人关注的论题。

总之,围绕领土问题,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相互对立,使战后日本努力与亚洲国家增进交流而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毁于一旦,这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更是与日本国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现在是需要我们对历史问题、政治问题认真进行反省的时候了,必须以新的姿态与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近邻国家重建新的友好关系。

纘纘 厚

2012年10月